

第七章 新疆三年的工作与见闻

美国人在新疆

在抗日战争以前，除了个别的美国旅行家到过新疆以外，全疆没有一个美国侨民。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间，在新疆的省会迪化却设立了美国领事馆。其经过内幕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个《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年下半年，美国将一批军火运到德黑兰，经过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进入新疆，再运进内地。这批军火是由一个美国少校率领一个车队运来的，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动的开始。

一九四三年（确切日期，我不清楚），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高斯以苏联对新疆有领土野心，企图把新疆变成为第二个外蒙古为借口，要求在新疆省会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看住苏联”。这个要求对蒋介石反苏反共的政策显然是有利的，他自然满口答应。于是，在没有一个美国侨民的新疆，就设立起美国领事馆来了。

这个美国领事馆的第一任领事是克拉布（Clubb），原在海参崴工作，是一个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第二任领事为华德（Robert Spenser Ward），原任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到任，于一九四六年冬去职。第三任领事为包懋勋（Paxton，包懋勋系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在中东伊朗等国工作，于一九四六年冬调来新疆任领事，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快解放前的一个多月才离开。包懋勋离开迪化后，其职务交领事馆秘书马克南（Mackennan）代理。此人是一九四七年七月

到迪化的，在新疆临解放的头几天，他把美国领事馆房屋、器具等托英国驻迪化领事福克斯代管，自己带着一个白俄，乘着吉普车跑到奇台乌斯满处进行阴谋活动后，乘车经柴达木盆地前往西藏，在行抵西藏边境的时候被西藏边防部队击毙，随同他去的那个白俄也负了重伤。这样，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也就从此结束。

克拉布我没有见过，他的情形我不清楚。华德和包懋勋两人，我和他们接触较多，下面是我对他们两人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四年华德到新疆后不久，当年十一月就爆发了伊犁事变，蒋介石派去镇压的一个师几乎完全被歼灭。当时我在迪化担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因为过去我在滇缅边境对日军作战时，曾和许多美国人在一起工作过，美国政府还赠过我一枚白口勋章，所以我很快就和华德成了朋友，有过多谈话，对于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比较了解。

华德的政冶观点大体如下：

1. 他认为战后美苏间应该进行全面合作，不应该互相猜疑。如果彼此扩充军备，进行另一次大战的准备，对人类将是很大的灾难。

2. 他也强调应给予殖民地民族以独立，但他所理解的民族独立是美国给予菲律宾那样的独立。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举行的庆祝美国国庆的招待会上发表的演说，主要内容就是极力宣扬美国在这一天给菲律宾以独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3. 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制定的和平建国纲领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两党应该根据纲领的原则处理各项问题，绝不应诉诸武力。当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各解放区时，他仍然希望马歇尔的调停能获得成功。

4. 他谈到新疆问题时，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殖民地统治，以致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解决的方法，必须做到民族平等，并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我问他在处理事变是否有国际背景时，他说：

“这很难说，外面有种种传说，说俄国人如何如何地帮助他们，但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当一九四六年六月间张治中和伊方代表阿合买提江等达成协议，行将改组新疆省政府时，他十分高兴，曾对我说：“这将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年七月，我以西北行辕参谋长的身分，偕张治中（张那时是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前往南疆视察，到过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他对我此行非常关心，当我于八月下旬回到迪化后，他特来看我，向我征询南疆之行的感想。

从上述几点看来，华德是美国罗斯福对外对内政策的一个竭诚拥护者。他在新疆的一年多里，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处得相当好。他有病时，都是请苏领事馆的医生诊治的。他在新疆并未积极活动，领事馆里只有在迪化雇用的一个职员和几名工友。他对于朱绍良和吴忠信在新疆的统治，常流露不满。当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情报机关，曾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九四六年冬，华德患肠结症，情况严重，当即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派人护送，乘苏联飞机到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治疗，据闻曾由莫斯科派来两名外科医生到阿拉木图为他施行手术。他病愈回到迪化后，曾把他到阿拉木图治疗的经过以及受到苏方很好照顾的情形，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去了没有多久，华德就被调职了，而且听说他以后被美国国务院整肃了。又一九四六年冬郑介民（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对我说过：“华德在新疆的言行，我曾告诉过司徒雷登大使。”这样看来，华德之被调离新疆，可能和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局）的活动也有关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由行辕参谋长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就职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派来接替华德的新任领事包懋勋就来到了。

包懋勋这个人，是美国多年培养起来从事间谍活动的能手。

他曾在我国当过某教會的傳教士，會說些半吊子的中國話，對中國的社會情形有相當了解。他的政治見解是：“美國至上”、“美國第一”，處處宣揚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夸耀美國的財富和強大，對共產主義運動是反對的，對蘇聯是仇視的。

包懋勛接任領事後，逐步擴充人員，積極開展工作。除了他的妻子擔任機密文件及密碼的保管和譯電工作外，領事館還增設有副領事、秘書等職。先後任過副領事的，有馬丁（Martin，一九四七年）、迪爾克遜（Dierksen，一九四八年）；任過秘書的，有博恩頓（Boynton）、麥克南（Mackennan）。先後來過的信使有克拉克（Clark）、凱斯勒（Kessler）、包奇朗（Bourgeron）、凱德（Kidder）等人。他還在迪化雇用了俄文和維吾爾文的翻譯人員。他又要求我的一个英文秘書卞宇彰（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每天去他的領事館作半天的英文翻譯工作。一九四七年南京美國大使館用專機給領事館送來一架超短波的無線電台，裝設在領事館的一間辦公室里。這部電台高達二、三公尺，據聞可與華盛頓直接通報，由一个美國人擔任保管、修理和收發電報。

自一九四七年初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包懋勛離開新疆時為止，他的重要活動約有下列几个方面：

1. 多方搜集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美国国务院给他的主要任务，而尤为重要的，则是侦察苏联是否有了原子弹——这是美国当时最为注意的中心问题。包懋勛到迪化后，第二次和我见面时（第一次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就谈起这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是否听到过苏联境内发生过巨大的爆炸声音。我说：“没有，只是听说苏联在新疆阿山地区，用几十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输在当地开采出来的矿产。”包懋勛又问：“这些矿是不是铀矿？”我说：“只听说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曾和苏联订有合同，在阿山的富蕴县开采钨矿，是不是有铀矿还不清楚。”他对于每一个从苏联境内来到迪化的旅客（除苏联人外），

总要多方设法向他们了解情况，尤其是关于原子爆炸的情况。

他对于新疆境内有多少苏联人，从事一些什么活动，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是否驻有苏联军队，苏联在这三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由苏联开采的乌苏独山子油矿的产量有多少，蕴藏量大不大，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对于苏领事馆吸收新疆人加入苏联籍一事特别注意，曾就此事向我询问过两次，并向迪化市的警察局探问过。

2. 搜集有关新疆地方的资料：关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和宗教信仰，新疆的矿产及农产品，新疆境内交通及通往苏联、阿富汗、克什米尔、青海、西藏等地的交通状况，各地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地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其政治倾向等等，领事馆也多方搜集这些资料。

3. 积极拉拢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他们所要拉拢的都是一些反苏反共的上层人物，凡属同苏方亲近或者主张亲苏的人，他都采取审慎和屏弃的态度。包懋勋所拉拢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曾任过新疆监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曾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长）、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色以提（南疆阿克苏的大阿訇）、尧乐博斯（哈密区行政专员）以及迪化维族中的大阿訇等人，哈萨克族的贾尼木汗（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哈德万（艾林郡王之妻，当时任迪化行政区专员）、萨力士（曾任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乌斯满（曾任阿山区行政专员）等人；回族中的马良骏（回族的大阿訇，曾任新疆省监察使）、白文显（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等人；蒙古族的乌静彬（汉人，乌省蒙族部落首领之妻）、乔嘉甫（原为塔城区蒙族的女王）等人。他拉拢这些人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向这些人宣传美国是最强大、最富有、最民主的国家，争取这些人在政治上倾向美国，投靠美国；一方面向这些人了解情况，经常约一些人到领事馆喝茶或吃饭，向他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藉以探悉各少数民族的内部情形。

4. 和官方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渗透：这里所指的官方，主要是指当时在新疆的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从内地去的汉人，而且除了极其个别的外，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在政治上倾向于美国的。虽然当时在新疆标榜着所谓亲苏政策，但包懋勋到迪化后不久，就看出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我曾问他对于亲苏政策的意见，他笑而不答。我又说：“我是请你以私人朋友的关系谈谈你的看法，不是要你作为外交官代表美国政府的意见说话。”这样，他才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说：

“据我了解，贵国政府二十年来和俄国的关系一直是不怎样友好的，一个地方政府能脱离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吗？如果中央行的是一套，地方行的又是一套，而这个地方政权又和中央的关系是密切的，这怎能使对方相信呢？盛世才曾有过一个时期和俄国人合作，但盛世才那时的政权是完全脱离了中央，形成独立割据的局面，现在能这样做吗？所以，依我看来，这项政策恐怕不易行得通。”他说的这段话，当然有他的用意，但确也道破了新疆当局所谓亲苏政策的实质。

包懋勋懂得在新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标榜亲苏，但是对美国人绝不会有所歧视。所以他常约上述这些机关的高级人员去领事馆吃饭、喝茶，藉以探听情况；有时他甚至事先不用电话通知，就一直跑到机关问情况。那时正值新疆多事之秋，我们基于利害关系，遇有重要消息也随时告诉他。在这方面，我和他的联系较为密切。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北塔山事件发生后，我经常将前方来的消息抄送给美领事馆；尤以苏联飞机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轰炸北塔山我守军阵地一事，我认为很严重，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打电话约包懋勋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把这个情况立即电告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有些美国记者曾向美国国务院询问这一事件的情况，国

务院的发言人答复说：“我们驻在新疆的外交人员曾从当地军方获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包懋勋并不以我们随时向他提供重要消息为满足，他还要千方百计地从我们的机关里收买干部，进行渗透。下面是几个例子：

我的英文秘书邝宇彰，每天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半天，包懋勋除了每月给他五十元美金之外，又对他进行诱惑欺骗。说过几年后，将负责设法送他去美国免费留学，条件是要邝宇彰在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和新疆警备总部为他刺探消息，搜集资料。邝宇彰受包懋勋的诱骗，就替他搞情报活动，但很快就被我发觉了。我曾警告他说，这样作是犯法的。

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一个楼科长，也被包懋勋收买，经常把公署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外交上的有关文件交给美国领事馆，随后也被发觉了。

此外，在迪化的基督教徒约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汉人。包懋勋夫妇常到教堂去参加做礼拜，并捐一些钱帮助办慈善事业，对这些教徒进行拉拢。

在我离开新疆后，听说包懋勋还派马克南到奇台去见过乌斯满，而马克南于一九四九年新疆快解放之前，又特地绕道到奇台和乌斯满会面。一九五〇年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人在新疆的叛乱，不能说和美国领事馆的阴谋活动没有关系。

一九四五年有一位美国少校马克宁（Mackenin）带着几个美国士兵，在新疆设了一个气象观测站。我没有和他们见过面，究竟他们干过些什么，我不清楚。到一九四六年，这些人都离开了。

一九四八年春（大约是三、四月间），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陪同美国大使馆武官苏洛（英文名字记不明确）准将，乘一架美国制的E24式轰炸机，飞到迪化。当时张治中不在新疆，在迪化行辕办公厅负责的是刘孟纯，我和刘对于他们的来临都感到突

然，因事先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此事曾引起苏联领事馆方面很大的注意。他们下机后，就向我们说明苏洛准将是来新疆旅行的。我和刘孟纯联名设宴招待了他们，我还陪同他们到头屯河（离迪化四十公里，原系一个小型的炼钢厂，以后停办了）的一个骑兵部队和在迪化附近的第九分校参观过。在他们来到迪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苏洛、侯腾有过二、三小时的谈话，并由侯腾任翻译。谈话内容颇为广泛，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苏洛准将曾向我询问了下列几个问题：

1. 他问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有多少，我告诉他大约有三万人。他问步兵多还是骑兵多，我说没有确实的资料，依据情况判断，骑兵可能多于步兵。

2. 他问驻在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多少，部队的装备情况和弹药的储备是否充足，补给和运输的情形如何，我没有列举详细数字，只是概略地答复了他。

3. 他问在新疆境内有几个飞机场，每一个机场的跑道有多长，是否每一个机场都贮存有供应飞机使用的汽油，我也概略地告诉了他。

4. 他问伊犁方面是否会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如果他们进攻的话，我们能否击败他们？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他们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如果只是伊方那点力量，我们是有把握击败他们的，但如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那就很难说了。在这一带地区的这些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大体相同，他们只要把服装一换，就很难辨别了。”

他们在迪化住了两天，除参观外，还游览了市郊的风景区，并买了本地出产的地毯、绒帽等，第三天早上就走了。

同年八月，我到南京和侯腾见面时，问苏洛准将春天去新疆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侯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的是侦察由兰州到新疆的航空线路，所以当时除苏洛武官外，还有几个关于航空、气象等的技术人员同去。

一九四八年四月间（也可能是五月上旬），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艾克瓦尔（Ekvare）由兰州乘吉普车来到迪化。他的父亲听说曾在中国当传教士多年，他生于甘肃某地，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迪化时，正好乌斯满也来到了迪化，包懋勋偕同艾克瓦尔来看我，要求和乌斯满会面，我答应了。第二天就约乌斯满和艾克瓦尔到我在迪化东门外的住所会见，我亦在座，翻译的有本部会说哈萨克语的蒋科长和英文秘书邱宇彰。艾克瓦尔先对乌斯满恭维一番，然后向他提出下列三个问题：

1. 当一九四四年伊犁事变发生时，是否有苏联的军队参加？乌斯满说：“我是在阿山地区起义驱逐盛世才的人，对于当时伊犁方面作战情形，我不清楚，是不是有苏联军队参加，不能肯定。但据我所知，红军第八团（即驻在哈密苏军的）从新疆撤走后，一直留驻在中苏边境上，要来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参加暴动的好些领导人，都加入了苏联籍，伊犁的苏联领事馆在当地很有权势，这是我很清楚的。”

2. 苏联在阿山地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分几个地方开采？每个地方有多少工人？苏联的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等有多少人？有些什么样的机器？开采出来的矿产物的形状、颜色？有多少汽车运输这些矿产等等。艾克瓦尔对这些问题，问得非常仔细，当某个问题答复得不够明确时，往往重复问几遍。当乌斯满答一段时，他就用笔记录下来，而且记得很详细，单是这一个问题，几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

3. 在中亚细亚地区是否发出过巨大的爆炸声？乌斯满说，他自己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听旁人说过。

谈话结束后，艾克瓦尔对乌斯满表示感谢，临行时又对我说，他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对我致谢意。

过了一天，包懋勋来找我说，艾克瓦尔想到北塔山去看看，问我能否同意。我答应了，第二天派了司令部的一个少校参谋陪他一道去北塔山。艾克瓦尔是自己驾吉普车去的，他在北塔山守

平的骑兵团长那里住了一晚，曾登上北塔山山顶瞭望北边的形势。他同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坚守阵地击退蒙古军进攻的马希珍连长会了面，并向他了解当时作战的详细情形。

除了美国军官来新疆活动外，不少美国记者也曾来过新疆。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记者法拉克(Waldo Diake)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到迪化，主要是想了解伊犁事变的背景。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因为我那时不在迪化。

《生活》和《时代》杂志女记者史迪芬(Baibara Stephens)于一九四七年初到迪化住了几个星期后，去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地旅行了约两个月。大约在同年四、五月间，她由迪化搭乘一架国民党空军C47运输机前往兰州，在酒泉附近飞机失事丧命，全机共二十余人均罹难，内中还有一位画家韩乐然。

史迪芬女士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为人爽朗诚挚，生活朴素。我和她曾见面三、四次。她从南疆回到迪化后，曾来看我，和我作了一次两个多钟头的谈话，由新疆省银行总经理罗志枚担任翻译。她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次谈话的内容记不完全了，但有一段在我的回忆中还是很清楚的。下面是她这段话的大意：

史迪芬说：“我没有到南疆去以前，在迪化逗留期间，和你们当中的好些负责人谈过话，也和在这里的我们美国人讨论过，大家都说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又是外交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个看法不对。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说只要实行亲苏政策，只要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问题就解决了。依我看，恐怕不这样简单。我在南疆旅行了两个月，在新疆人口最多的喀什、阿克苏两地呆的时间较久。我深入社会的基层进行调查，同许多劳苦人民在一起过了好些日子，才了解他们所渴望的并不是民族独立或民族的高度自治；他们也并不是如外面所宣传的那样仇视汉人，只是由于受宣传煽动的影响，造成对汉人仇视的心理而已。当然

他们更谈不上要同哪个国家亲善和同哪个国家不亲善的问题。他们所最关心的是如何能使他们那种贫穷痛苦的生活得到改善的问题，那怕只是稍许的改善也会感到满意。”她列举了好些她亲自看到的当地人民生活贫困的具体事例。她说：许多人吃不饱，更不必谈什么营养的话，许多人穿得很破烂，住的地方肮脏污浊，好多儿童没有衣服穿，绝大部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出门不带面纱就会遭到阿訇们鞭子的抽打；在人口那样稠密的地区，几乎没有一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等等。然后她又说：“地方上封建势力很大，那些阿訇们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象这样，纵然把汉人的官吏全部撤换赶走，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所说的这一大段话，实质上说的是当时新疆的阶级矛盾问题。我那时只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还不理解她的含义。解放后，经过学习，我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后，回忆起她的话，才理解到她那些话的深刻意义。现在把她的这段话追述出来，作为对这位美国进步作家的纪念。

美国国际新闻处记者罗伯逊（Robertson）、美联社记者麦斯特逊（Masterson）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先后来到迪化采访关于在北塔山中蒙军队冲突的原因和战况。其时正值由前线送来缴获蒙军的作战命令、旗帜及一门苏联制造的小炮等物，我接见了他们，并把这些物件给他们看，他们都拍了照。关于苏联飞机协助蒙军轰炸我北山塔守军一事，我也根据前线部队的报告告诉了他们。他们又曾问到这次冲突是否纯粹是边境的争端。我答复他们说：这是一个边界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罗伯逊并获得我的允许，到北塔山去采访过。

纽约每日新闻报女记者派克（Peggy Parker）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方面的消息。我同样地把所获得的前线情况告诉了她。她还直接去访问了苏联总领事馆，与萨维里耶夫总领事在谈话中弄得面红耳赤。据她说由于她当时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萨维里耶夫拒绝回答，以至造成尴尬的局

面。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兰德 (Ch·Rand) 于一九四七年九月来到迪化，那时正值继北塔山事件之后的吐鲁番暴动发生，伊犁方面参加省政府的人都离开了迪化，局势相当动荡。他来见我时，除北塔山问题以外，还谈到新疆的整个形势。

《纽约时报》记者立伯门 (Lieberman) 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来迪化，那时我刚刚离开新疆，没有见着他。只听说这个记者的态度很蛮横，坚持要到伊犁去访问。当外交特派员公署拒绝他的要求时，他竟然咆哮地质问：“伊犁是不是你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去？”经向他多方解释才作罢。

《芝加哥日报》记者巴纳特 (Barnett) 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迪化，那时我已不在迪化，他的活动情形我不清楚。

除了以上所述的美国记者之外，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 (Morrison) 曾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到迪化访问，我没有和他见过面。法新社记者沙瓦莱力 (J·Salvarelli) 于一九四七年九月由曾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陪同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事件的消息，并曾经到北塔山去过，拍摄过好些电影。

苏联人在新疆的活动

远在帝俄时代，俄国就存有觊觎新疆的野心，并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擅自派兵进入新疆，占据伊犁，最后与清廷缔结《中俄伊犁条约》，割去我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赔偿帝俄所谓“代收代守伊犁兵费”九百万卢布。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又派兵进入新疆协助盛世才平定叛乱，并取得了在新疆的驻兵权。这些都是人所共知之事。现在只就我在新疆时耳闻目睹的几件事，记述出来，藉供有关人员进行参考。

一、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张治中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

到迪化与伊宁方面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和平谈判，那时在新疆负军事指挥责任的，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有一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张治中、朱绍良、吴忠信、郭寄嶠、李铁军、宋希濂，吴忠信那时是新疆省府主席，郭寄嶠是第八战区副长官，李铁军是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一块吃饭后，朱绍良对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伊宁事变发生前，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Евсеев）的一件事。

朱说：我来新疆后，只在普通的应酬上和苏联总领事见过两次面，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叶代总领事带着翻译来见我，对我说了好些恭维话，并特别强调中苏间的友谊，他告诉我十一月七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于明天正午，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午餐，并说这次午餐是专诚请我的，晚上才正式招待迪化市的各界人士。我听了很高兴，满口答应了。第二天，我如约前往，他们十分殷勤地招待我。进餐时，除叶代总领事外，还有几位副领事及一位秘书和一位翻译参加，他们轮流向我敬酒，更在中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的口号下，一再干杯，菜也特别丰富，一直吃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散，这时我已经有些醉了。晚上七点，是苏领事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正式招待各界人士，我不能不去。他们又是多方劝酒，饭后还有跳舞等节目，仍是不断喝酒，到深夜我才回来，已是酩酊大醉。躺在床上，完全象是死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十一月八日）上午九点多才苏醒过来。当我刚刚醒来时，于达参谋长（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国民党军入新疆后，被派来充任朱绍良的参谋长）已站在我的床边，神情紧张地向我汇报昨晚深夜在伊宁发生事变的情况，并请示如何应付？于参谋长说：“本来早晨三点钟就已经得到伊宁发生暴动的消息，因长官酒醉叫不醒，只好等候。”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苏联领事馆所谓专诚邀我吃饭，原是一种阴谋，上了“老毛子”的大当。朱绍良在讲述过程中，越说越激动，最后犹悻悻地大骂“老毛子”

不止。

二、张治中代表南京政府与伊方代表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谈判，并经过不少波折，才达成最后协议，订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晚八时正式签字。新大楼的一个会议室里装饰了一番，张治中备了几桌丰盛的酒菜，准备为和平谈判获得成功而好好庆祝一下。协议全文用汉文、维吾尔族文各写了两份，用的是最好的纸，字也写得十分工整。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一张大桌子上摆放着协议文件，真是一切俱备，只待签字了。七点刚过，伊方首席代表阿合买提江及代表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等人就来到了，紧接着苏联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偕几位副领事也来了。叶谢也夫一踏进会议室，他就要阿合买提江把协议条文一条一条地念给他听，当念到某条“县政府科长以上的职员由县参议会推荐”时，叶谢也夫就用自己的自来水笔把这一条改为“应由县长自己任命”；当念到某条“由地方保荐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员由中央任命”时，他又用笔改为“只要由各区人民代表选举，不要由中央任命”。他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引起大家的震动，张治中立即邀集我们一些主要负责的干部开会。大家情绪都很激愤，张治中来新疆负责后，对苏方多次容让，这次他也有些气愤，连说了两声：“太不象话，太不象话。”最后他仍然主张容让，接受叶谢也夫涂改的“县政府科长以上的职员由县长自己任命”的意见。至于“由地方保荐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员只要由各区人民代表选举”的意见，张治中认为与叶谢也夫的意见并无矛盾，因为这十五名省府委员是由各区推选出来的，只是加上由中央任命的手续而已。决定这条维持原文，并向叶谢也夫说明。这样，又把协议全文重新写过，忙碌了一番，延到九点多钟才正式签字。

三、一九四五年四月间，我到新疆不久，就听说有好些新疆人拥有双重国籍，当时还以为只限于十月革命后退到新疆境内的俄国人（即所谓白俄），以后才逐步了解到苏联驻在新疆境内的各领事馆，吸收新疆各族人加入苏联籍，以在伊宁、塔城为最多，

其次为迪化和喀什。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担任西北行辕参谋长，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曾要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军务处（实际是军统局的新疆站）和迪化市的警察局秘密调查在省会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苏联籍，其后他们提供我的资料说约为八百人左右，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占多数，大部分住在南梁一带。在南梁的南端有一个归化族（当时所谓归化族即系白俄）的文化俱乐部，经常有各种活动，苏联的电影片常在那里放映。有一天，情报人员告诉我，说加入苏联籍的人，当晚将在那里集会，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到了傍晚，我偕军务处副处长姚铁珊着便服混了进去。一看，会场里人挤得满满的，估计约有四、五百人，大多是维、哈族人。我们进去时，秩序较乱，人声嘈杂，没有多久，苏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是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人，忘其姓名）出现在讲坛上后，人们才安静下来。我因恐怕被他们发现，同时听不懂语言，便和姚铁珊悄悄地溜出来了。

四、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曾以大批军用物资器材支援我国，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酬答苏联几批物资，如锡、铝、茶、羊毛之类，后来由于盛世才忽然变脸反苏，致有约三千一百吨物资停留在猩猩峡（今称星星峡）和哈密两地，没有运走。自张治中来新疆负责，出现一个暂时和平的局面后，苏联便向张治中提出照会，要求由苏方派车运走，沿途由新疆省政府负责招待食宿，并要求每车由苏联武装士兵两名押运。张治中就此事召集有关人员数次开会。我认为由苏方派武装士兵押运，有损国家主权，一再表示反对。张治中力主答应苏方要求，以重友谊。为了这个问题，我和他曾争得面红耳赤。但张坚持要这样做，我亦无法阻止。这时，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伊方的地下组织已有相当发展，尤以吐鲁番为甚。我恐苏方利用车运的便利，秘运武器交给伊方地下组织，因此曾派了大批便衣人员沿途监视。关于由苏方派兵武装押运物资一事，张治中并未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就这样办了，曾

受到相当的责难。

五、一九四七年春天的一天，有一个锡伯族人来见我（那时我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说有机密事要向我报告，我接见了。他对我说：“我会俄语，昨天我从哈密搭乘苏联民航机来迪化，在机上有几个苏联人，我听到有一个苏联人悄悄地对另一个苏联人说：‘八号到了酒泉，十一日到了兰州。’”我仔细思索他们的话，可能是苏联方面派的间谍到了那里，特地来告诉你，希望予以注意。”这个人年约四十左右，我始终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联系这件事，回想我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间到喀什时，曾有好几个人对我谈起：驻在喀什的苏领事馆派遣受过很好训练的人乔装商人，前往西藏地区进行活动的事情，我感到这个人的判断可能是对的。

六、一九四七年春，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维吾尔族文化委员会，经常组织大批维、哈族青年进行游行示威及请愿等活动，使迪化市处于紧张状态。有一天深夜，军务处处长余万选带着一个姓李的青年（二十多岁）来见我，这个姓李的神情紧张地向我陈述他被绑架和受刑讯的经过。他说：“晚上八点多钟我在南梁街上行走时，突然有几个维族青年胁迫我，叫我跟着走，走到一条巷子里，他们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住，挟着我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后，进入一个房子，才把我的眼睛打开。室内有三个人，都是维吾尔族，内有一人善说汉语。一开始，他们对我还客气，向我询问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飞机场的汽油库存置地点，军械库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这些仓库的戒备情形，以及迪化市驻有多少军队和驻扎地点等。我答复他们说，我不是军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不信，开始对我采取威胁态度，我仍然说不知道，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双手反捆起来，对我拳打脚踢，并打我的耳光，吼叫着要我讲。我对他们说，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打死我也无办法。于是他们停止打我，有一个人从一口箱子里取出一架电机，先放在我的腿上，以后又放在我的身上，弄得我

浑身发抖，头上出汗，十分难过，他们拼命地催着我讲，我实在讲不出什么。这样折磨我，足足搞了两个钟头。最后，他们认识到没有希望，才又叫两人把我眼睛蒙住，把我送出门走了一段后，那两人把毛巾取下将我一推就跑掉了。我遭此意外横祸，心情恐怖万分，急忙走上大街，对那房子的地址、门牌，我无心查明。”我问：“大概是在什么方向？”李答：“大约是在苏联领事馆的西北角附近。”我又问：“你看这件事是否同苏联领事馆有关系？”李说：“这很难说，不过那架刑具——电机，肯定是苏联的，上面还有俄文。”此事我曾命军务处会同迪化市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没有结果。

七、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驻在新疆的部队由于缺额太多，又不敢征收本地的维、哈族青年当兵，经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由陕、甘两省拨补新兵一万五千人，陆续运入新疆，这本是很寻常的事情，不料驻迪化的苏联总领事竟向外交特派员刘泽荣说：“中国军队大量地运入新疆，威胁着苏联的安全。这样做，恐怕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现。”虽然还不是一种正式抗议，却是明显地干涉别国内政。

迪化二二五事件发生的原因

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迪化开始和平谈判，由于问题的复杂和双方的猜疑，经过许多波折，一直延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才达成最后协议，并签订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的条款，计十一条。另有两个附件：一为新疆省政府组织办法，一为事变区域内参加的武装部队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办法。

新疆省政府改组后，张治中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任副主席，在二十五名

省府委员中，事变的伊、塔、阿三区占有委员八人，有的担任厅长，有的担任副秘书长、副厅长等职。例如赛福鼎当时就是担任教育厅长。

七月一日新的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委员同时宣誓就职，国民党政府特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南京飞到迪化监誓，并在新大楼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约有一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张治中、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会上讲话，都说从此要为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和平的新新疆而努力。张治中还特别强调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重要性。

久经动乱的新疆人民，对于这个新的省政府，寄以很大的期望。但真正了解新疆真实情况的人，是并不那样乐观的。主要的症结是双方各自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十分尖锐的斗争，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不断派兵向解放区进犯，在人民武装力量打击下，遭到挫败。此时的南京政府不可能以相当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应付新疆的局势，因而它对付新疆的基本政策只能是维持现状，力求安定。张治中就是以“安定新疆，安定西北，解中央西顾之忧”的使命来担任甘（甘肃）宁（宁夏）青（青海）新（新疆）四省军政领导的责任，并以新疆为重点。而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进行的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新疆脱离国民党统治，当然不会以伊、塔、阿三区的暴动获得胜利而满足，必然要把这个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在全新疆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鼓动，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斗争手段来实现其目的。

立场不同，目标不同，又怎能做到和衷共济，真正团结呢？

阿合买提江等参加省府工作后，便从伊宁调来大批干部，除一部分在迪化工作外，派出许多人往南疆各地进行“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活动。迪化市原有一个维吾尔族文化促进总会，在吴忠信主新时期，这个维文会是由亲国民党的保守势力领导的，阿合买提江等用种种办法，很快就改组了维文会，并牢牢

地掌握了维文会的领导权，以这个作为公开斗争的场所。同时在全省会议上推荐一批人安插在省府所属各部门工作，并提出以伊方的阿布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经张治中同意和省府会议通过任命。吐鲁番是维吾尔族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位于天山之南，为迪化通往哈密及内地的交通咽喉。伊方推荐阿布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具有深意，是一着很厉害的棋，以后发生了吐鲁番暴动事件，是和阿布都热合满之任县长有密切联系的。继阿布都热合满任吐鲁番县县长后，伊方又提出以阿布都克日本买合苏木为喀什区行政专员，亦经省府会议通过。此人当时年纪已七十多岁，曾到过莫斯科，其子女等多到苏联留学过，他和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常有联系。发表后，引起喀什方面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纷纷打电报给张治中要求收回成命，张治中认为这些人的行为一定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尤其是驻在那里的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支持，因杨德亮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一向是和地方的保守势力伙同一气的。张治中并派我（那时我的职务是西北行辕参谋长）乘飞机到喀什去劝说他们，要他们遵从省府的决定，并要我在那里为新任的行政专员阿布都克日本买合苏木监督就职。同时，张治中又命我到和田、莎车、阿克苏，库车、焉耆、哈密等地视察驻军，并对干部说明新疆省政府改组后的政治形势，今后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以及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阿合买提江等利用阿布都克日本买合苏木充任喀什区行政专员的便利，派了一批人去那里积极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几千名青年参加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经常游行示威，喊着：“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民族部队”，“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等口号，并与驻军经常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使这个南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喀什，笼罩着风暴即将爆发的气氛，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那里负责工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怀着恐惧的心情，不断地向张治中和陶峙岳（陶那

时是新疆警备总司令），报告这种危险的情势。

其他各地，伊方当然也派人去活动，但由于那些地方的政权掌握在亲国民党的人手里，并与驻军密切结合，使活动受到了限制和打击。例如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虽是维吾尔族人，但在内地住过很长时间，他的老婆是个汉人；又和和田区专员郝登榜，阿克苏区专员色以提，虽也都是维吾尔族人，但他们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大阿訇，是坚决反对伊宁方面的革命运动的。至于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焉耆区专员左曙萍，则是从内地到新疆去的，在其辖区内，严密防范伊方的活动，自更不用说了。

新疆那时分为十个行政区，伊宁、塔城、阿山三个区为三区革命势力所控制，在国民党政权所能控制的七个区里，自新的省府成立后，由于三区革命势力的渗透，在迪化和喀什两个区，形势是比较严重的。而这两个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处于较其他各区为重要的地位。

我从南疆视察部队回到迪化后，向张治中汇报了部队及地方情况，张治中对我说：“新的省政府成立以来，伊方不断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并怂恿青年经常到省府请愿，在街上游行示威，闹得乌烟瘴气。看来他们（指伊方）是没有诚意的，前途很难乐观。充实新疆的军事力量十分重要，你去和陶总司令商量，提出一张要求充实的具体数字表来给我看看，然后你准备于最近到南京去见总裁（蒋介石）和陈总长（陈诚）报告新疆情形，并请求增强新疆的军事势力。”我和陶峙岳及几个高级幕僚经过几度商讨，拟就了一个请求国防部充实新疆军事力量的项目和数量表，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只记得如下的一些主要款项及数量：

1. 成立六至十个边卡大队，每大队约为五百人，将来担任一些边境的戒备，使正规部队集结整训，应付事变。
2. 包括成立边卡部队在内，要求补充新兵四万人。
3. 要求调一个炮兵团入新。

4. 要求增调两个汽车兵团入新。

5. 请求补充驻新部队的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手枪、火箭筒、战防炮以及通讯器材、工兵器材等等（具体数字，记不明确了）。

6. 补充军马五千匹，请拨款就新疆、青海两省购买。

我们拟好了这份请求单后，我和陶峙岳同去见张治中会谈，张看了后说：“要求得太多了一些，恐怕办不到。”我们说：“我们是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如果国防部能答应给一半，也就不错了。”张说：“好吧，就这样办。”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我带着张治中写给蒋介石和陈诚的两封信及一份请求补充驻新部队兵员武器器材表飞到南京，那时蒋介石还在庐山，我又赶到那里去见他，向他汇报了新疆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蒋介石用心地听取了 my 报告后，只说了下面几句话：“你回去告诉各级干部，在边疆地区工作要特别警惕，部队驻地的警戒要严密，一点都不可以疏忽。”我又把请求补充兵员武器器材等的一份报告表交给他看，他立即用桌上的一支红铅笔在报告表上批了“交陈总长酌情办理”几个字，并签了他自己的名字，就交还给我。其时适新疆省府委员艾沙（维吾尔族，在内地住了多年，善汉语。艾沙和在省府担任建设厅长的穆罕默德·伊敏及当时任新疆省监察使的麦斯武德等人，基本上都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这一派人也抨击中国历届政府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但又害怕苏俄式的革命，对苏联存有戒心，因而不主张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只是要求实现民族自治。并主张将新疆省更称为突厥省，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人的同化政策。所以他们又可称为突厥主义者。由于他们离开新疆多年，组织基础没有广泛建立，只有一部分势力。他们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运动，是对立的，所以被伊方指责为汉人的走狗，说他们出卖民族利益。他们过去被盛世才赶出新疆，吴忠信主新时期，也不允许他们回来，

这次张治中特地邀请他们回到新疆，并以相当重要的职务，目的是想利用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伊方对立的矛盾，希望能在他们的影响下，可以削弱三区革命的势力）率领二十多个维吾尔族青年到庐山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叫我等两天再走，嘱咐我和他们多谈谈，并说他准备招待他们一次。这样，我又在庐山多生了三天。

我由庐山回到南京见陈诚后，陈诚对我说：“共军力量快打到长江边上来了，首都都感到威胁，刻正调集大军进行反击。对共产党问题，想用政治方法解决是很困难的，非用兵不可，因此中央目前对新疆还不能大力支援。你们所要求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国防部当在可能范围内拨发。我把你的报告交给郭次长（郭忏），要他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商定。”随后，陈诚又谈到新疆问题。他认为新疆问题与国内整个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他肆意地诬蔑中共，说中国共产党和三区革命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因而他认为新疆问题不可能真正和平解决。

我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张治中给我的任务上，向国防部要兵，要武器，要器材，接洽的最后结果，详细的项目数字，我记不明确了，主要的大致如下：

1. 允许第一步先成立四个边卡大队。
2. 允陆续拨给补充兵一万五千人，大部分由甘肃省的几个师管区征拨，一部分由收编的伪军挑选。
3. 允增派一个汽车兵团入新，约有载重卡车三百余辆。
4. 允补充军马三千匹，就地征购。
5. 无炮兵部队可派，但允于适当时期派一个重炮兵营驻酒泉，必要时入新。
6. 补给一批武器器材弹药等。

我于十月下旬回到迪化，向张治中汇报了南京之行的结果。大约过了四、五天，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调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调充西北行辕副主任，住兰州代张治中处理行辕事

务。十一月三日我接任新职，行轅参谋长职务，由副参谋长刘任补充。

这时的局势，愈益朝着有利于三区势力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则在不断削弱和动摇。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新的省政府成立后，政治、军事、经济等均应成为统一体，不应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阿合买提江等仍想牢牢地控制伊、塔、阿三区（阿山区行政专员乌斯满不愿受阿合买提江等人的控制，直接向张治中联系，是伊方所没有料到的事情，也是伊方极不愉快的事情），不容许省府过问他们的事情，也不允许派任何人进入三区视察调查。当三区革命起来时，塔城区专员平戎等率军警及汉族回族等老百姓共一万四千多人退入苏联的阿牙固斯，和平条款签订之后，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遣送回国，并由新的省府商定组织了一个接运小组，前往塔城办理接运事宜。而这些人于一九四六年九月间分批回国时，在塔城一带备受凌辱殴打，内中有三十五人，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又省府根据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举行县参议会和县长的民选，决定在十个行政专区各派一个监选小组前往监选，各小组人选经过省府会议几次的慎重研究，获得各方的同意，但派去阿山专区担任监选的小组长涂禹则及省府秘书克斌全（涂禹则、克斌全两人均系哈萨克族人）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路经塔城区的额敏县，他们两人和汽车司机均同时被杀害。根据和平协定第二个附件，规定事变区域内的参加部队应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以及进行点验和建立供应制度等问题，曾由我和陶峙岳、郝家骏（新疆供应局局长）罗开甲（行轅少将高参）等人与伊方的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等人先后开了四、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是争论一场而散，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样，伊方在三区内的政治上军事上都巩固其既得地位，保持特殊化，使得张治中根本不能过问。另一方面，伊方利用参加省府工作的便利，在国民党统治的七个行政区内，大力发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得局势日益动荡不安，尤以维吾尔

族聚居较密的地方，不断发生事故，有殴打汉人的，有与驻军发生冲突的，有拦劫军车的，有抗交公粮的……至于游行示威，散发和张贴各种煽动性的标语传单，更是经常发生。在省会迪化，由阿合买提江等人亲自领导，以维吾尔族文化会为中心，经常有成百上千的维族青年和一部分哈族青年在开会，控诉历代汉族统治者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暴虐统治，指责国民党对新疆人民的虚伪欺骗，并指责麦斯武德、艾沙、贾尼木汗、哈德万等人为民族败类，号召青年起来铲除他们。经过每次的开会，群众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激昂，意见也就越来越多，随即成群结队上街游行示威，并高喊：“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口号，然后拥至省政府请愿，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多达数十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其主要部分，大致如下：

1. 中央军立刻撤出新疆。
2. 短期内于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
3. 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机关，一律改隶省政府。
4. 将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交省府办理。
5. 彻底整顿警察，严禁非法拘捕人民。
6. 罢免司法机关领导人员，司法工作由当地人士自行管理。
7. 成立宗教厅。
8. 立即开放伊宁通南疆阿克苏的冰达坂道路（达坂是山隘，当时是封锁的）。
9. 罢免哈德万与萨力士。
10. 彻查社会处账目。
11. 应以民主方式选举地方各级行政人员，各区专员应选当地人士充任。
12. 救济失业的人民。
13. 财政厅应发给各县农民十个月期限的贷款，并贷给农民种子、牲畜、农具等。

14. 财政厅应贷给手工业者一年期限的薄利贷款，并借给商民六个月期限的巨额贷款。

他们几次到省府请愿，张治中派秘书长刘孟纯接见请愿代表，答应分别研究办理，有些问题经提出省府会议讨论，并作了相应的决议，部分地接纳了请愿者的意见。请愿者们提出的条款虽多，但主要目的，是要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撤换亲汉人的维、哈族人士，以及中央军撤离新疆。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是无法答应这些要求的。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请愿者的游行示威就愈来愈频繁，态度愈来愈激昂，有时几百人，有时几千人，拥至省府请愿，坚持要张治中亲自出来答复，常常整天以至夜晚都不肯离去，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当时住在迪化城内的，大部分都是汉人和一部分回族人，城外多为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尤以南梁一带，维族人聚居较多。）他们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汉人和回族人、以及少数的满族、锡伯族的大恐怖。随着动荡不安的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太软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掉，批评责难，不一而足。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张治中感到伊方给予他的压力太大，当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的重大，于是就一再召集会议，谋求应付局势的办法。我记得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间，张治中在新大楼（张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连续邀集党、政、军、特负责人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有：刘任（行轅参谋长）、刘孟纯（行轅秘书长）、陈希豪（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谢永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杨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谢、杨两人均为“中统”骨干分子）、王曾善（民政厅厅长）、刘亚哲（迪化市警察局长）、宋希濂（新疆警备总司令）、沈静（警备总部参谋长）、马呈祥（骑五军军长）、叶成

(七十八军军长)、罗恕人(四十六师师长兼迪化警备司令)、梁客浔(新疆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余万选、姚铁珊(军务处处长、副处长。这两人是军统骨干分子。当时的军务处,在名义上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归行辕直接指挥)等人。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座谈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一致认为局势日趋严重,应采取有效方法遏制伊方势力的发展。会上有人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和伊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最后张治中也同意这样办。并推定刘孟纯、梁客浔、谢永存、杨为、余万选、姚铁珊、刘亚哲、黄锡恭(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人组织一个小组,研商具体办法,由刘孟纯负责召集。

一九四七年一月张治中去南京,临行时还嘱咐我们对于用组织对组织,用宣传对宣传的方针,要积极进行。

刘孟纯根据张治中的指示,曾多次召集会议,所商定的各项办法,我均充分予以支持。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主要的有两项,概述如下:

1. 由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新疆日报》等单位,发动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强调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坚决反对任何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企图,严正指责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运动;同时大力宣传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新疆省政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即是新疆省政府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拥护国家统一,保障全省和平,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主政治等。并反对伊、塔、阿三区的特殊化。

2. 以汉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的汉人,由刘效黎、刘永祥等人负责;以回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回族人,由向文显等人负责;指使哈德万、萨力士等人分化哈文会(即哈萨克族文化委员会),尽可能的掌握一部分哈族青年,因当时哈文会已被伊方控制。其次还有蒙文会、满文会等也均多方策动他们

起来反对伊方。

通过上述这些文化委员会，分别召集汉、回、蒙、满、哈等族人，进行宣传鼓动，说伊方如在新疆得势，则在新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将无生存的余地……等等。

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其他各民族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与阿合买提江等所领导的维文会唱对台戏，这是二二五流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维文会与汉文会的请愿活动

一九四六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规定新疆产生代表十八人。张治中在省府会议提出由伊、塔、阿三区产生七人，另外十一人由其他七区产生，经会议通过。三区代表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其他七区的代表有哈德万、艾沙、乌静彬、乔嘉甫、伊敏、赵剑锋等人。国民党政府这次片面的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的，并拒绝参加。当时我以为伊方的革命运动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中共既反对这个会，阿合买提江等人可能不会去。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合买提江等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去，而且是去了，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听说阿合买提江到南京后，以新疆一部分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出“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案了，引起国民党内许多负责人的震动和不满。张治中得讯，深恐此案被一笔抹杀，完全否决，会引起不良后果，乃去电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白崇禧、陈诚等人解释，并另电请邵力子向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开导，交谈多次后，结果阿合买提江把已提出的提案自动地收回了。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目睹南京政府政治的黑暗，派系的斗争，物价的飞涨，人民生活的痛苦等等情形，增加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阿合买提江等自南京

回到迪化（大约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后，更锐意于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积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二月二十日维吾尔族青年多人在维文会召集了一个“迪化市自由大会”，由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主席发表了一篇很激烈的讲话，痛斥汉人统治所给与新疆人民的种种痛苦，只有结束汉人的统治和中央军立即撤离新疆，新疆老百姓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等语，博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随即游行示威，一路高呼“中央军撤出新疆”，“反对汉人的统治”等口号。到二十一日，维吾尔族青年又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在过去的一般游行示威，只有几百人，多则千余人，而这次达到五千人以上。并制有用维文写好的各种口号的大小旗帜，浩浩荡荡地从维文会出发，由南梁入城，在几条重要街道游行后，即拥至省府请愿，由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他们推选出来的几位代表。请愿事项，除前文所述各条外，又增加了十多条，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省府立即罢免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区行政专员尧乐博斯、莎车区行政专员周芳刚、和田区行政专员郝登榜（郝为维族人，通晓汉文汉语，曾被盛世才羁押七年，出狱后任社会处副处长，一九四六年春由张治中派充和田区专员）。请愿者要求刘孟纯立即答复。但问题性质太严重，当然不是刘孟纯所能作出决定的，因而他的答复只能含糊其词。请愿者们不满刘的答复，群起质询责难。刘舌敝唇焦，也无法说服他们。自下午两三点钟起，直到晚间，请愿者们在省府前坪坚持不散。有的高声叫嚷，有的围坐议论，刘孟纯处境十分狼狈，因他这时是不能离开省府的。通过电话和外界的联系，由屈武（屈那时任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多次奔走，最后，经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商定，要刘孟纯答复请愿者允于明日（二十二日）召开省府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要求，俟作出决定后，再具体的答复他们。因当时张治中不在迪化，刘难以抗拒这种压力，就照阿、包两人的指示答复了请愿者。灵得很，请愿者们认为满意就散去了。刘从

省府回到新大楼和我们见面讲述请愿者态度的“咆哮强横”和他所处的窘境时说：“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在省府会议时，阿合买提江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理由，会强求通过一些重要的决议的。果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省府召开了紧急会议，由阿合买提江主持，首先由包尔汉副主席发言，从维族青年请愿的要求说到莎车监选的情形。他力述专员周芳刚与驻军相勾结，如何如何阻挠选举，力主接纳群众的意见，撤换周芳刚。继由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人提出书面的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与维族人在请愿时所提要求差不多，而讨论的重心则是放在撤换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迪化区专员哈德万的问题上。当这些议案提出讨论时，刘孟纯、王曾善、贾尼木汗等人表示反对，争论不休。到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主张邀请请愿代表到省府会议室来陈述意见，大家同意了。不久，马合苏木等人就出现在会议室里，由马合苏木发言，他慷慨陈词，力诉汉人在新疆统治的黑暗，新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说汉人应该立即退出新疆，……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指着各省府委员们说：“你们八个月来在干些什么，你们是跳舞的委员，还是做事的委员？你们是想为新疆人民做点事，还是只想骑在新疆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会场里空气十分紧张。当时只有贾尼木汗说了几句话，驳斥马合苏木，汉族委员，无一人发言，情况十分尴尬。阿合买提江这时提出先罢免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的议案，无人表示反对，遂当场通过了。

省府紧急会议的情况和撤换郝登榜、周芳刚两专员的决议，当晚就传遍了整个迪化市，在汉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普通的汉族居民（多半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在郊区的一部分农民），深恐发生第二次伊宁事变，在民族仇恨的斗争中，无辜受害。例如我的一个同乡龚沛生，在迪化东大街开一家小药铺——杏林

春，他深夜跑来见我，说外面谣言很多，人心惶惶，问我有无危险？是不是要赶快离开回内地去？又在三道坝种田的农民有一百多户，大多数也是湖南湘乡人，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了几个人进城来找我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刘臻（刘与这些农户是同县同乡）问情况。在各机关任职的汉人，更是议论纷纷，以为这样下去，不要多久，不是被维吾尔族人起义所杀害，就是被赶出新疆，展望前途，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至于回族人及平日和汉人比较亲近的一部分维、哈族人等，亦同感危惧。同时，这一消息，也引起一些人的愤慨，认为实在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退让了，应该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意见，在当时的中上层干部中占了上风，而我则是这种意见的积极支持者。

二十二日晚间，我们在新大楼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我及刘任、陈希豪、谢永存、刘孟纯、王曾善、梁客得、沈静（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等人，由刘孟纯汇报了当天省府会议的详细情况后，大家认为决不能使七个区的统治权就这样逐步丧失，必须采取坚决对抗的方针。并决定以示威游行对付示威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给伊方势力以反击。由刘孟纯、谢永存、梁客得立即进行具体部署。

二十四日上午，迪化市区的回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举行联合游行示威，人数约有三、四千人，有十多个哈族人骑马先导，沿途高呼：“拥护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万岁”，“新疆是十四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反对伊、塔、阿三区特殊化”等口号。游行后拥至省府请愿，提出了请愿事项二十余条。这一举动，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相当大的震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反请愿的事情。尤以这天哈族人参加的不少，更出他们的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早已掌握了哈族中的大多数，以为跟汉人走的不过是哈族中的少数上层分子而已。

这一天回、哈族人的联合示威，给住在城内的汉族人以极大的兴奋和鼓舞，成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人数特别众多的原因。

二十五日一大早，在汉文会就聚集了大批汉人，会里的礼堂和街道上挤满了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包括由苏联境内遣返回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街道，也在集合，有二、三百人一堆的，有四、五百人一堆的。到了十点钟左右，这些游行请愿的人，一批一批地陆续来到政府前面坪地集合，总人数达一万人以上。这对于当时只有八万人口的迪化市来说，确是空前的。参加的绝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少数的回族、哈族、满族人在内。

这次请愿，在未发生事故以前，组织得相当好，秩序井然。集合完毕，由汉文会的刘永祥等，把队伍整顿好，他们请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出来答复。当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住在南梁（即南门外）的南花园，闻群众到省府请愿的消息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即乘车赶来省府，群众热烈鼓掌欢迎，并让出一条大道。群众推了十几个代表，向阿合买提江递请愿书，约有二十多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主要是要求：

1. 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取消地方特殊化。
2. 伊、塔、阿三区的边境，应由国军派兵驻防。
3. 伊、塔、阿三区的地方武装，应照和平条款的规定，切实改编。

4. 严厉惩办伊宁事变时残杀当地无辜居民的凶手。
5. 从优抚恤事变时被害者的家属。
6. 要求发给难民救济费。并妥善安置。
7. 反对企图把新疆脱离中国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
8. 加强民族团结，反对煽起民族间的歧视和仇恨。
9. 要求严厉制裁破坏社会秩序分子。

以及要求实行法治，严惩贪污和切实实施省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等等。

阿合买提江于接见代表后，登上临时由几张桌子拼搭起来的讲台，向群众讲话，讲了约一个多钟头后，群众不满意他的答

复。队伍里人声开始嘈杂起来，有的大声质问他，有的喊他下来，甚至还有骂他的。阿合买提江这时处境尴尬，但态度还相当镇定，仍想通过翻译向群众解释，而有一部分群众（据我事后了解，这些人多半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或者是伊宁事变被害者的家属）已控制不住积在胸中的郁愤，态度越来越强横，高声叫嚷，使得阿合买提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得走下台来，和一些省府委员们退到省政府里面去了。这一来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激和哗噪，队伍的秩序也开始乱了，有十多个人走到包尔汉副主席乘坐的小汽车旁边坐下谈天，包尔汉的司机（维族人忘其姓名）坐在汽车里喊他们走开，那些人不理，司机便大声辱骂，并从汽车里走出来把一个人打了几下。这就大大地激怒了群众，他们和司机大吵起来，有的喊打。司机见势不佳，立即跑进省府大门口传达室，将门紧闭，从窗户口用手枪向人群中乱放，登时有两人负伤，弄得秩序大乱。但群众并没有因枪声而散去，相反地，情绪更加激昂起来，必须致司机于死命而后快。在那些难民中，有些人过去曾在盛世才的部队里当过兵或当过下级军官，内中有人跑到在那附近的军统的一个站所去弄来了一颗手榴弹，他从侧角接近那传达室，把手榴弹从窗口扔进去，一声爆炸，司机当场被炸死。这时在省府里面会议室里的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及省府委员们闻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群众的吼叫声，吓呆了，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深恐群众冲入府内，立命将省府大门关闭，由省保安副司令党必刚亲自指挥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保安队士兵约有四、五十人荷枪实弹，严密防范，并架起两挺轻机枪对着大门外，作准备射击姿势。这是当天下午二时左右的情况。

紧接着又发生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互相打杀的事情。

当阿合买提江等人被困的消息传到维文会的时候，有些人十分担心，约有十多个人跑到省府前坪来窥察情况，不料这时有二十几个哈萨克人也跑来看热闹。这些哈族人是属于迪化区专员哈德万

手下的，与这些维族人向来处于对立地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看见那些维族人立即喊打，有一个哈萨克族人手里持着一根铁棒，即举起铁棒对准一个维族人的脑袋打去，那个维族人立被击毙。维族人见势不佳，纷纷逃跑，哈族人追着打，又被打伤两三人。经警察赶来干涉，才制止这些家伙乱打乱闹的行为。

请愿的群众，认为阿合买提江没有很好地答复他们的请愿事项，不肯散去，看见省府大门紧闭，更加被激，先是在大门外高声叫喊，继之以敲门，均无人答应，群众便用石头砸门。因大门坚固，扔石头效果不大，于是，有部分人跑到附近一家木料店扛来几根大木头，许多人抬着撞击大门，并且吼声震天。我得此消息，觉得事态严重，也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立派迪化市警察局局长刘亚哲亲往劝告和负责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命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立即出动部队戒备。刘亚哲乘汽车赶到现场，高叫不要撞打大门，群众静下来了，刘便站在雪堆上对群众讲话，大意是劝群众不要采用这样的暴力行动，如果把大门撞开了，蜂窝似的拥进去，伤害了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就会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新疆整个局势也很不利……最后，他劝大家解散回去，问题以后再解决。群众开头不肯散去，刘苦口婆心地劝说，同时宣布军事当局绝不容许对省府委员们有任何伤害行为。群众这时态度才开始缓和下来，有些人同意解散，有些人则向刘提出今后维族人是不是会向我们寻衅报复？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刘亚哲说：“我以警察局长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对你们的安全，绝对负责。”这样，群众才开始散去。与此同时，我下令全市宣布戒严，所有街道要口，均满布岗哨。刘亚哲俟群众散去后，叫开省府大门，派警士护送各委员回家，刘则亲自护送阿、包两副主席回去。

第二天屈武委员对我说：当群众撞击大门，吼声震天时，他们在省府会议室感到情势十分紧张，有些人提议从省府后院一间卧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坚持不同意，并说：

“他们如撞进来，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并以敬佩的口吻说：“在这样临危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不失为革命者的本色。”

这一天的流血事件，就我的记忆，死者是两人，受伤者有五、六人（因事隔多年，记不明确）。

事件发生后的当晚，我把经过情形电报蒋介石，并要求批准我宣布戒严的临时措施，两天后接蒋复电，嘱我妥善应付局势，并批准戒严措施。同时我也将情形电告在南京的张治中，并请他早日回迪化。

张治中于三月十六日从南京回到迪化，紧接着于三月二十五日以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全省同胞书的文告，内容共分十点，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维护和平，积极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其中有这样几句：“如二月二十一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二十五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都必须加以纠正的。”

北塔山事件的历史背景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新疆北部爆发的北塔山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有不少的中外记者都跑到新疆去采访消息，作过各种各样的报道。在那一时期里，许多人对北塔山事件的发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是单纯的中蒙边境纠纷事件；有的则认为苏联继承帝俄的政策，企图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脱离中国，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际由苏联来控制；有的认为是外蒙古军队在苏联指使下，与伊犁事变集团相呼应，目的在于消灭在阿尔泰（即阿勒泰）地区和它们相对抗的乌斯满的力量，解放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名叫《北塔山风云》的连环画，则把北塔山事件说成是我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指使下干出来的，并把当时尚未到新疆的一个名叫马克南

(Mackennan) 的美国人说成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策划人(马克南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初到迪化的, 而北塔山事件是六月五日发生的。他先在领事馆任秘书, 以后代理副领事, 我仅和他见过一次面),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管怎样说,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 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北塔山事件发生时, 我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负有守土之责。当得知外蒙古军队无端向我守军进攻时, 便严令驻守北塔山的骑兵第一师的马希珍连坚决抵抗, 并命驻在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韩藩立即率该团主力前往增援。不久, 在缴获蒙军的战利品中有蒙古边防军司令的一个作战命令, 这份命令中的第一条就说: “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被华军侵占, 驱逐华军, 巩固边防, 是我们的神圣任务。”我看了这个文件后, 弄得莫名其妙, 因为在我的脑海里, 一直认为北塔山距离外蒙古边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既然蒙军这样说, 不能不认真研究一下, 我就约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关系的一些人(记得有汉文会会长刘效蓼, 外交特派员公署科长水建形等人), 并搜索了一些文献资料(例如杨增新所著《补过斋文牍》等), 开会研讨, 从资料中和同他们的谈话中, 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况:

1. 辛亥革命后, 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 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宣布独立, 一九一二年春派兵进攻科布多。

科布多在清朝设有参赞大臣管理地方军政, 在行政区划上直隶中央。当形势危急时, 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当时在伊犁设有镇边使, 在阿尔泰设有办事长官, 均直隶中央)派兵往援, 但援军尚未集结, 科布多就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失陷了。外蒙军攻陷科布多后, 又于一九一三年七月间两次进袭阿尔泰地区的察汗通古, 均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派驻在那里的部队击退。指挥官为旅长蒋松林, 团长张健。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

阿尔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及驻迪化领事先后照会我国政府及地方当局说：“中国军队万不可逾越阿尔泰山之北，如果贵国军队调到萨克赛，我国自有对付的办法，其阿尔泰及沙拉苏美（即承化）等处，难免我国不发军队占据。”同时俄国自库什莫敦开拔部队五千，进驻科布多东南之胡芦库勒及喀喇乌苏，策应外蒙司令丹帕藏宗，并派兵进入喀什、伊犁，以威胁新疆当局。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软弱无能的，既不敢发兵抵抗，又不能据理力争，以不扩大事态为理由，遂在北京与俄使开议和约，循外交途径由中央与地方同时解决：

（1）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国外交部与俄国公使签订声明条件内开：“外蒙古自治区应以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2）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俄国驻阿尔泰领事库申科于承化寺（即沙拉苏美）签订中蒙临时停战军队驻扎界线条约，其第一条全文：“中国军队与喀尔喀军队，自此条约有效期内，均以阿尔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条约第八条内载的奎屯山起，东至江噶什，顺布尔根河至济尔噶朗河口，再东南经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凯，至哈尔根图阿满止为界，彼此不得越过界线，更不得彼此开仗。但驻在察汗通古一带的中国军队，于此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并声明：此条约系指双方驻军地点而言，与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疆界问题决无干涉。就在这个时期，俄国驻阿尔泰领事曾一度提出，说什么：“据科布多蒙古长官来信，深以布尔根疆界一节为不然，欲请划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为界。”这就可以看出帝俄侵占阿尔泰整个地区的野心，并未因签订了声明而终止。

幸次年（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帝俄倾全力在西方作战，无暇东侵，到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遂使阿尔泰边界得

以十年无事。

当外蒙军队在苏俄怂恿下进侵阿尔泰时，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均系直隶北京，各自为政分治，鉴于形势孤危，经新疆都督杨增新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伊犁镇守使杨飞霞等多次协商后，于一九一四年将伊犁镇边使撤销，改为镇守使；一九一六年塔城参赞撤销，改为塔城道；一九一八年阿尔泰办事长官撤销，改为阿尔泰道，都归并入新疆省。

2. 外蒙古侵占阿尔泰领土的经过。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外蒙军进犯布尔根，掳去布尔根县佐，威胁当地蒙民归顺。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新疆多处发生变乱，外蒙乘此机会，又派兵越境窃据布尔根河县境。一九三五年我阿尔泰区行政长沙某（可能为沙力福汗）派秘书长满开与科布多行政长官布在岳尔毛盖图会议，曾议定“以阿尔泰山正千分水岭为界，凡阿尔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属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属外蒙”。按此规定，所有乌梁达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尔根河，外蒙自应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城归还新疆，乃科布多并不履行规定，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境推诿不还。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外蒙科布多边卡队忽进占本布图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尔齐克一带，强迫我边卡士兵撤退，我清河设治局局长郭永隆亲往本布图与外蒙边卡官才楞会晤，要求外蒙军队退出侵占的地方。才楞竟强词夺理地说：

“本布图、也楞齐、哈尔齐哈图、哈拉巴尔齐克等地，均属外蒙地界，中国边卡部队现驻扎哈拉巴尔齐克等地，乃系属于外蒙地界，应请迅速撤退。”郭局长答称：“科布多与阿尔泰原日交界，北至乌梁达坂，东北至门开海尔根雪山，系以阿尔泰正千分水岭为界，外蒙古据我布尔根县境不还，复又侵占至察汗河地带，实非善邻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边卡官才楞理屈词穷，乃说：“我系奉政府命令驻防边卡，不能商谈边界，应该双

方电报政府，听候派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双方暂驻现时地点，不要冲突，以免违背双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驻本布图，华卡驻哈拉巴尔齐克）。”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军队全力戒备日本关东军，无暇侵略阿尔泰，我西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阿尔泰，得暂保全。

苏联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地图，竟将阿尔泰山脉南面全部山岳地带分别划入苏联及外蒙版图，界线达于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数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瑞士、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的总和。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苏联政府是具有承袭帝俄企图侵占阿尔泰的政策。

乌斯满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一块广大的领土，南北二千二百公里，东

正如古语所谓“以肉为食酪为浆”。现在多有以馕作为主食的（馕是以面粉特制的，可以长期保存）。同时以牛、羊奶晒干制成的“奶疙瘩”，也是一种富有营养和耐饱的食物。由于经常和自然界接触，加上吃的东西富有营养，所以一般人的体格很健壮，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喜狩猎，精射击，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战的人称为“巴图鲁”（英雄的意思）。

乌斯满生于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就反对盛世才的专政，起初只有七个伙伴，以后得到阿尔泰区多数哈族人的拥护。因他骁勇善战，而被称为“巴图鲁”。盛世才曾几次派兵去剿他，由于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时得到外蒙的支援（一开始，外蒙曾援助过他，以后不知何故决裂了），盛世才消灭不了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爆发了伊犁事变，乌斯满参加了这一运动，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相继脱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统治。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三区的军队继续向精河、乌苏进攻。自九月三日起，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精河，伊方军队以重炮、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精河守军约一个师兵力全部覆灭，乌苏守军随即受到威力强大的攻击。至九月五日，乌苏被陷，守军大部分被歼灭。至此，三区军队一直推进到绥来的玛纳斯河的西岸，距省会迪化仅一百四十多公里。同时对南疆更分路进攻，全省陷于动荡混乱中。

那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迭电向蒋介石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蒋介石接电后，甚为焦虑，即派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飞往迪化，指示他调查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张治中于九月十二日飞到迪化（那时我被派为驻新疆第九分校主任，与张同机飞迪）。十四日会见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他的意见，叶谢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

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张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代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叶谢也夫答应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助。张治中了解国民党在迪化兵力单薄，人心惶惶，除设法和平解决外，别无他途，遂电蒋介石建议通过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并于十六日离开迪化，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全文如下：

据苏联驻伊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维民数人，自称是新疆暴动的人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国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维民在新疆占多数的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即塔城）、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的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的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经造成的局势。

国民党政府经过几度研商后，决定派张治中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会谈，并答复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张治中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由重庆飞到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这次谈判，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七日开始，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止，达成了初步协议，主要是关于改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组织办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纲领；第二阶段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起至六月六日止，才达成最后协议。

这一阶段的谈判，主要是关于三区民族部队的编组和驻地等问题。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张治中被派为西北行辕主任，我被派为西北行辕参谋长，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陶峙岳调西北行辕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原在新疆负军事、政治责任的朱绍良、郭寄嶠、吴忠信等均另调他职，离开了新疆。

当时我们对于伊、塔、阿三区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乌斯满便于八月间派代表来迪化要求见张治中主席，张治中先叫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了解来意后，认为乌斯满是阿尔泰区专员，是伊犁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单独接见，恐怕引起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约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接见乌斯满的代表。这位代表当面交出乌斯满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条款签订后，阿尔泰区并没有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派人前来晋谒。其次，要求哈萨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厄木汗（当时担任财政厅厅长）、苏来满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对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解释。第四，地方各项困难，请求救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是边防重要，请派军队进驻。

自和平条款签订和省政府改组以来，伊犁方面一直拒绝张治中派任何人进入三区，成为省府工作上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乌斯满的代表一来，使我们显然看出他们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们理解到阿合买提江等对三区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

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公开会见乌斯满的代表后，这位代表又向张派来负责招待他的人表示，说还有机密事，要单独向张主席报告，张又叫刘孟纯和他秘密会谈。据刘告诉我，这次会见，除谈了一些阿尔泰区的情况外，主要有两点：1. 说苏联借口和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批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有将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把矿砂运走，乌斯满反对，

想用武力将他们赶走；2.请求迅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入阿尔泰支援，并接济枪械弹药。

张治中召陶峙岳、刘孟纯和我商讨这个问题，我和刘孟纯均主张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尽可能接济乌斯满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必要物资，但不赞成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因距离过远，补给不易。至于苏联在那里开采钨矿一事，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慎重处理，反对乌斯满想用武力驱逐的意见。当时张治中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他又恐怕被伊方发觉，引起摩擦，使许多问题，不易商讨解决，因而他有些犹豫。最后，他指示先拨发乌斯满一些弹药及一些日用品等，交那代表带回去，并叫刘孟纯答复乌斯满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苏联派人开采富蕴钨矿问题，我们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但须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成功后再提。乌斯满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

第二，关于边卡部队问题，根据和平条款，是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边卡部队目前不能派遣。

乌斯满的代表得到答复，并领到一些弹药物资后，于八月二十八日离开迪化回阿尔泰去。及至九月三日，乌斯满又派第二个代表来了，名字叫拉提甫，说是因第一次派来的代表出发后久无消息，所以再派他来，路上也没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这位拉提甫代表带来乌斯满的信件，比上次代表带来的更具体，其内容主要有：

- 第一、请政府即派军队开入阿尔泰；
- 第二、请政府接济枪支一千支到二千支；
- 第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尔泰；
- 第四、请省府将阿尔泰专区经费直接发给；
- 第五、请省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

乌斯满为什么要接连派代表来见张治中呢？我于一九四七年

冬在奇台和他会面时，他曾和我详细谈过，现记述其大意于下：

“我们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人，与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的哈族本兴是同一血统，苏联革命后，对在俄国境内的哈族人残酷镇压，有许多人被杀害了，财产被没收了，宗教信仰被剥夺了，现在新疆的一些哈族部落是由俄国逃过来的，因此我们哈萨克族人非常害怕和仇恨苏联（就我所知，十月革命在中亚细亚俄国境内也进行着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那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和一些宗教头子等，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对和害怕这种革命，是自然的）。当一九四四年伊犁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曾和伊犁的一位哈族首领爱力汗订过一个密约：1. 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企图；2. 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这主要的两点获得了爱力汗的同意后，我才参加伊犁的事变，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事变发生后不久，爱力汗发现事变集团的一些重要负责人，有的是苏联人，有的加入了苏联籍，例如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就是苏联的柯尔克孜族人，是苏军中的一个军官，其他好些人或者是长期住在苏联，或者是在苏联求学，大多入了苏联籍。他们受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指挥，他们发动事变，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爱力汗和在伊犁一带的一些哈族首领，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大多被他们逮捕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我和爱力汗的关系，知道我不同情他们的主张，觉得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指挥，就想收拾我，他们拉拢阿尔泰区的另一个哈族头目达里力汗来和我捣乱，想以达里力汗来代替我，所以我要请求中央政府帮助我，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乌斯满第二次派来的代表拉提甫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治中召集我们商讨过好几次，有时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才散，最后，张治中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决定尽可能地支持乌斯满。他指示刘孟纯把阿尔泰区专员公署的行政经费直接发给，不再经过伊犁方面转发，把阿尔泰行政区的专员印信交代表带去，并拨发阿尔泰专员公署一部分粮、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等。这些措施，并

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宣布。同时，张治中又指示陶峙岳和我，发给乌斯满部步枪四百支（或者是三百支，确数记不明确了），轻机枪十多挺，以及必需的弹药等，并命军务处（即是军统局派在新疆的特务机关，这个军务处名义上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处，实际上受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处长余万选派一个电台随拉提甫一道到乌斯满那里去（我记得这一组电台一共去了三个人），随时报告那边的情况。张治中并指示我和陶峙岳，这一工作要绝对机密地进行，万不可使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关于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区一事，我们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不是不想派去，而是限于当时的军事力量不够，尤以补给运输上的困难，只好作罢了。

张治中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呢？主要是他和阿合买提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张治中的目的，是希望伊方和他通力合作，逐步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他所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新新疆”。逐步地实施县级以下的地方自治，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运输以及普及教育等事业。并要求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接受改编。取消三区的特殊化。关于新疆的国防，完全交由中央政府驻新疆的军事指挥机构负责处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目的，则是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在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要求将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一律改属省政府，要求撤换除伊、塔、阿三区以外的其他七个区的行政专员，推荐他们的人到南疆各县去担任县长等职务……至于取消三区的特殊化，以及三区武装力量的改编等问题，则根本采取拒绝态度。并以迪化维吾尔文化会为中心，经常组织一批人游行示威，到省府请愿，要求这样那样，南疆有些地区亦常发生游行示威等种种事情。张治中所要的是社会的秩序和安定，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要的是煽起各民族起来驱逐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势力，甚至有人还是要驱

逐和消灭在新疆的汉人。

两种立场，两种目的，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由于伊方的要求过多，而且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例如要国军撤出新疆等问题），使张治中深感难以应付，利用乌斯满来分化和牵制伊方以减轻其压力，这是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和他自己的切身利益，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种手段的。

张治中把经费物资等直接交给乌斯满，引起伊方的严重不满，而暗地接济乌斯满枪械弹药以及派去电台，也不可能不被伊方侦知的。伊方对乌斯满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乌斯满为人的跋扈，早已不满，原来是想利用达里力汗来削弱和牵制乌斯满，同时仍然想拉拢和团结他。及至乌斯满两次派代表到迪化，并得到张治中的支持后，就把乌斯满当成敌人看待，认为非彻底消除不可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伊犁方面从伊宁、塔城等地调集三个骑兵团，并附以炮兵，归伊斯哈克江指挥，向阿尔泰进兵，乌斯满势力仅一千多人，自然不敢与之对抗，曾通过我们派在那里的电台，一再要求派兵前往支援，我们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如派少数兵力去，不能与伊方匹敌，反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派较大的兵力（一个骑兵团左右的力量）去，补给大成问题。同时考虑到如果伊方再增兵，则和平局面就会破裂，所以没有答应乌斯满的请求。当时也考虑到乌斯满势力被伊方消灭或驱逐后，奇台一带有被伊方势力从阿尔泰南下袭击的危险，为预防万一，当命驻在奇台的骑兵第一师（这个部队是属于青海马步芳的，一九四五年冬开入新疆，师长为韩有文）派出一个连开往北塔山戒备，侦察伊方军队的行动，并相机与乌斯满部取得联系。

乌斯满在伊方军事势力的压迫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间退出承化（即阿勒泰县府），退到青河以北的温都哈拉附近与伊方势力周旋了一个时期，以力量悬殊，遭受相当损失，到三月间被迫退到苦儿图，伊方势力继续进迫，四月中旬又退到大石头与乌龙

布拉克一带。这两个地点均在北塔山的西端，距离骑一师马希珍连据守的阵地约有二十多公里。我当电飭马连长与乌斯满密切联系，并予以必要的支援。同时我又电知派在乌部工作人员转告乌斯满，表示慰勉。嘱暂在北塔山附近休整，不要急图反攻，所需粮秣及必需日用品，当迅即运送救济。并要他尽可能地侦察伊方的军事行动，随时电告。

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写一封信给迪化行政专员哈德万。这封信是对全国同胞及伊斯兰教徒发的，在这封信中有如下的语句：

“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首先举起了革命的旗帜，我乌斯满在八年以前就领导着哈萨克族的优秀青年与盛世才暴虐的黑暗政治奋斗到现在，我们以为和平条款签字，民主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我们革命的目的，就算成功了一半，其余应该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实施各项建设。岂知我们的革命就在此时变了质，为革命而牺牲奋斗的哈萨克同胞反而成了被清除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自本年二月一日起开始向我们阿尔泰区进攻，我乌斯满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区的专员，我是国家的官吏，有守土的责任，为了执行和平条款，为了奉行施政纲领，保障国家领土，拥护张兼主席建设新新疆的政治主张，我们阿尔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坚决对一切破坏国家统一，摧毁宗教的恶势力，予以严重的打击……希望全国同胞，尤其是伊斯兰教胞，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给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以最大的援助。”

这封信曾译给张治中看过，他不许发表，因为恐怕刺激伊方，引起和平的破裂。同时他更恐怕刺激苏联，因为信中提到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强大武力”，似系影射苏联。

中蒙军队激战北塔山

北塔山是译名，曾被译为拜塔克山、拜山、巴他克山等名称。北塔山的位置约在北纬四十五度点三，东经九十一度点一，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左右。距离奇台约二百多公里，为迪化、阿尔泰、哈密三区间的要隘。其北面为蒙新边界的阿尔泰山，西南临准噶尔盆地。从奇台北上青河、富蕴等县必须从这里经过。山的西面有大布逊，是个小市镇，为牧民的交易场所，在杨增新、金树仁时期，大布逊一带驻有军队，防备山北的哈萨克寇扰奇台等地。盛世才时期，在这里设有警察派出所，历任所长多为哈萨克族人。迨一九四〇年阿尔泰山东部发生事变后，北塔山形势更加重要，一九四一年以后，盛世才为了控制东部阿尔泰山并向青河、富蕴等地出兵，从奇台北山旁将军戈壁东部修了一条汽车路，直通喀喇同克，北塔山便是这条汽车路上的要站。一九四四年冬季乌斯满率部在阿尔泰地区暴动后，很快就席卷富蕴、青河，并将北塔山的警察所捣毁。

北塔山东西长约三十华里，南北宽约二十华里，山上都是高大的原始森林，山坡是草地，山上山下都有泉水。气候变化很大，冬季积雪很厚，夏天晚间在山上也要穿皮袄。

自奇台至北塔山之间约二百公里的地区，沿途都是茫茫的戈壁，没有什么人家。

从北塔山向东北行，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最近的地方——察汗通古，按中国《中报》馆出版的地图比例计算约有四百多华里。过去新疆的统治者，一直在北塔山东北的布尔根，设有一个设治局。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由于他在阿尔泰哈萨克族中的号召力，归附于他者日渐增多，由原有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人，吃的方面大成问题，要求救济的电

报，不断拍来，张治中命省政府及新疆供应局（这个供应局是属于军事系统的）拨发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去，伊方表示不满。他们指斥乌斯满为反动分子，是贼娃子，是强盗。他们开除了乌斯满的阿尔泰区专员的职务，由伊方派达里力汗继任。新疆省政府为了了解问题的真相，曾由省政府会议决议推包尔汉副主席，保安副司令党必刚等人于四月四日飞到承化进行调查，在那里只呆了几天就回来了，听说带回了一些当地居民控告乌斯满的文件，并向省政府汇报了情况，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乌斯满是不甘心于他的失败的，退到北塔山附近后，仍不断向青河一带进行游击，成为威胁阿尔泰的不可轻视的力量，所以伊犁方面对他仍深具戒心。

当时我派在北塔山担任戒备的马希珍连占领的阵地，是在北塔山最高峰——阿同敖包（汉语）与北坡二层山峰——恰里台，大小胡较尔台一带。他们用石头和木料，构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外蒙的边防军派来代表两人（着普通便服，未着军服）到北塔山见马希珍连长，说马部所驻的一带地方是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马连在四十八小时内退出，马连长答复他们说：“我们这里离你们外蒙古边界还很远，从来没有听说这带地方是属于你们的，我连奉命驻守此地，有守土之责，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是不能退出的。”双方争论很久，马连长叫两个代表暂留，候打电报向上级请示。马连长认为外蒙古边防部队的要求完全无理，所以也没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只作为一个寻常的事件来处理，这个请示的电报经过其师部军部的辗转，送到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时，已是冲突发生后几天了。实在的，他们也绝没有料想到外蒙古军队会越境突然向他们进行攻击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黎明，外蒙古军队一营，附有炮兵一连，突然向马希珍连进行猛烈攻击，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阵地外，并有涂有红五星标志的飞机五架投弹轰炸和低飞扫射我守军阵

地。这些飞机还向乌斯满部驻地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带投弹多枚。马连官兵英勇抵抗，他们凭借工事沉着固守，当外蒙军冲到阵地前时，投掷多量手榴弹，使外军遭受损失，攻势顿挫，就这样，打退了外蒙军的数次冲击，一直到黄昏，战况才缓和下来。外蒙军原以为一举就可消灭马连，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这一天的战斗，我马连伤亡士兵十余人，马被炸死数匹，外蒙军的伤亡较我为大。

马连长当晚以紧急电向其军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军长）报告外蒙古军队向他突然进攻及战斗经过和伤亡情况，在电文中指明那五架飞机是苏联飞机，并请求派兵增援。马呈祥军长于六月六日清晨持电来向我报告，我认为问题重大，立即召集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供应局局长夏日长、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及部分参谋人员开会，研商对策，当决定：

1. 命驻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韩藩即率该团主力（留一个连在奇台北面担任警戒）前往北塔山增援。

2. 派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前往奇台负责办理对北塔山部队的补给事宜，抽调一个汽车连（约有可用卡车十多辆）和一个骆驼大队并组织当地的一部分大车，专任该方面的运输。

3. 命骑五军驻在迪化附近的部队，立即调一个团开往阜康，准备支援奇台方面。

4. 为预防伊、蒙互相勾结向我大举进犯，立即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5. 组织一个参谋组（由总部及骑五军参谋人员组成）前往北塔山了解情况，并调查自奇台至北塔山一带的军事地理。

6. 嘉奖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马希珍连，发给该连官兵奖金。

7. 将外蒙军队向我进犯情形，分别电南京国防部及兰州西北行辕报告。

我把紧急措施处理后，即从总部所在地——东花园，走到新大楼去见张治中，向他报告北塔山方面发生的情况，及我所作的

几项重要处置，他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惊异，随即把副参谋长刘任、秘书长刘孟纯叫来，我们几个人商谈了一回，谁也没有想到外蒙军的行动是属于边境纠纷的问题，当时只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

第二种看法：认为可能有较大的企图，先消灭乌斯满部后，由北塔山南下，袭扰我奇台、镇西、七角井一带，截断我通往兰州的交通线，然后从正面玛纳斯河发动攻击，胁迫我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

张治中侧重于第一种看法，我和刘任较为侧重于第二种看法。

张治中同意我所作的各项紧急处置，并嘱将所得情况随时报告他。

外蒙军于第一次攻击失败后，于六月六日进行了一天的调整和准备，七日晨八时，先以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后，随即投弹轰炸，与此同时，其炮兵亦集中火力向阵地轰击，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的步骑兵便开始接近我阵地，在对面山腰里，他们的重机枪以炽盛的火力掩护其突击部队前进，我守兵很沉着，一再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先是马希珍曾派其副连长到大石头与乌斯满联系，告知外蒙军进攻情形，乌斯满对他说：“我知道外蒙军的情况，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他们再来侵犯时，我来帮你们打，一定把他们打败。”他的态度和语言充满了狂妄和自信。到七日这一天，当外蒙军再度向马连进攻时，乌斯满果然自动地率部参战，先在北塔山的北边山腰地带与外蒙的骑兵部队激战，互相冲杀，这样，也就掩护了马希珍的左翼。乌斯满率部百余骑与外蒙军队激战几小时以后，他本人突然单人匹马，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外蒙军重机枪阵地，挥刀砍死机枪射手两人，夺得重机枪一挺，又迅速地跑回来了。

七日这一天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外蒙军志在必得，所以攻

势较五日那一天猛烈，曾几次突入我守军阵地，而守军马希珍连知道他们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因此全连官兵百余人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战斗意志很旺盛，同时他们也知道增援的部队快要到来，只要能坚持一两天就行了。加上这一天有乌斯满部的助战，战斗到黄昏，终于打退了外蒙军的多次攻击，而保持了原来的阵地。八日上午外蒙军又在其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击两三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而这时我增援部队骑二团已经陆续到达了。是日午后，我军开始反攻，聚集在山麓的外蒙攻击部队，看见形势不利，遂撤退到北边高山去了。

这几天的战斗，我军共伤亡二十余人，被炸死马十多匹，外蒙军遗弃在我阵地前的尸首三十多具，其受伤人数，估计较阵亡人数要多二、三倍。

我军缴获蒙军小炮一门，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手枪两支，无线电机一部，军旗数面，以及文件地图等。乌斯满部缴获的，未计算在内。

被击毙的外蒙军遗尸中，有上尉军官一人，可能是个连长，在其图囊里有作战命令等文件，我得知后，即嘱马军长转知韩团派专人送来迪化，经派人翻译（我看过那份文件的原文，不是通常所见的蒙文，而是用俄文字母拼的）后，是一个外蒙边防军中校某某（其姓名记不得）所下的命令，并附有这个部队的编组表一份和进攻部署的要图一张。记得这个部队的编组大致于下：三个步骑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小炮排（有两公分的小炮两门）、一个通讯班，并配属一个山炮连（有火炮四门）。因此判断向北塔山马连进攻的外蒙军，大约是一个加强营。

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其余各条，则是赋与各单位的作战任务。我们看了这份作战命令的文件后，才发现这次冲突，还包含着有所谓边境问题。

我们将外蒙军向北塔山进犯及有苏联飞机助战种种情形，电报南京国防部，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政府所属各报，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均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同时一再发表社论，谴责苏联和外蒙的侵略行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院部，也对这件事表示异常关切，立法院和行政院均曾就此事开会讨论；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指示各地的“民意机关”、“文化团体”等纷纷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注意，并力主中央采取强硬外交政策。青年党的头子曾琦除发表谈话攻击苏联的侵略行为外，并赋诗登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大报上，我记得有这样两句：“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忽寇玉门关。”

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在实质上都是为了反共。国民党政府一向诬蔑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他们撕毁政协决议，发动的大规模内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头破血流，军事势力日益削弱；而在蒋管区内的广大人民进行着“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英勇斗争，也弄得他们焦头烂额，形势日益不利。想利用这一事件，煽起一个反苏高潮，来转移国人的视线，并借以打击中共。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分别向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严重抗议，苏联政府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其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递交我外交部复文一件，否认苏联政府曾参与北塔山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六月二十二日由其驻莫斯科公使以复文交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坚持北塔山系在蒙古共和国疆界之内，中国军队侵入蒙境，才引起军事冲突等语。同时据合众社伦敦六月十六日电：莫斯科电台广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称：蒙古边防守军乃因华军越入蒙古境内，遂被迫在飞机掩护之下，加以击退。该电台否认华方所传进攻中国疆界之说，并斥为捏造之言，显有挑拨的作用云云。据该电台广播六月五日事件的真相称：中国军队一个分遣队，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疆界，在梅尔丁戈尔河（译音）一带边境，布置十六公里长的阵

地，掘设壕沟，并于袭击蒙古边境哨兵时，调兵增援，蒙古边防军司令曾派人往见华军部队长，要求退出蒙古境内，但遭拒绝，使者并被其扣押，因此蒙古边防军遂被迫采取击退侵犯者的措施。边防军部队一营，在蒙古空军飞机数架掩护之下，迫使进犯者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边防军在采取此项军事行动时，并未越入中国境内。华军撤退后，乃在六月九日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及边防军士兵四人的尸体，身上皆有严刑拷打的伤痕。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保留要求中国政府严惩罪犯，及赔偿蒙古所受损失的权利。

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想以此来掩饰它的侵略行为，因我们当时派到北塔山担任警戒的，只有一个骑兵团，这个团离其后方基地达两百多公里，何致于更前往蒙古边境袭击蒙古边防军哨兵？我派到北塔山去调查情况的参谋，曾一再向马连官兵询问有无离开北塔山再向北面去活动的事，他们都坚称没有过，掘设壕沟，布置阵地，均在北塔山，蒙古人民共和国答复中国政府的抗议，坚持说北塔山系在外蒙疆界之内；外蒙边防军司令的作战命令，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他们的任务是要驱逐华军。这就充分说明进攻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外蒙军多次进攻不能得逞，在我军阵地前遗弃尸体多具，在六月八日晚，蒙军派兵将尸体拖回去，绝不是什麼“华军撤退后，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者及边防军士兵的尸体……”。外蒙军原派来的使者两人，我好象记得马呈祥军长说过他们（指马希珍连）曾怀疑那两人是间谍，因而在战斗中他们将其杀害是很可能的，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其情形我记不清了，至于说到苏联飞机参战之事，因为当时在新疆部队的官兵，都不认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和飞机标志，看见涂有五星红旗的就认为是苏联的。当马希珍这个电报送到新疆警备总部时，关于苏联飞机问题，我们也曾讨论过，并报告了国防部。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乌斯满部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有些哈萨克人一度侵入蒙古境内，劫掠蒙古人的牲畜并捕人等行为，因而引起这次冲突。但以后我和乌斯满会面向他询问时，他坚决否认有过这种事。纵使有这种事，亦绝不能认为这是外蒙古边防军采取的自卫行动，因外蒙军司令曾通牒马希珍连限四十八小时内退出北塔山阵地，随后在其作战命令中又明确地写着：“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这样，问题就很简单，如果承认北塔山是属于我国的领土，则外蒙军向北塔山的进攻就构成了一种侵略行为，决不能以其他理由来冲淡和掩饰这一事件的本质。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他自己贸然发动的内战，不到一年功夫，损失甚大，军事上节节失败，形势日益不利，现在又爆发了北塔山战争，他深恐伊蒙结合，进兵迪化、哈密，那时无力支援，势必丢掉新疆，会更加动摇他的统治地位，感到很苦恼；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除指使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传苏联和外蒙的侵略，想借以转移国人的视线，借以打击中共外，他又决定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专程去新疆调查北塔山事件并视察驻新国军，想把这次事件更加扩大，以取得美国及国际上一切反苏势力的同情和支援。

蒋要派白崇禧去新疆，是六月十二日决定的，并定于十三日起飞，同时以电报通知了张治中。张治中于六月十二日深夜收到蒋的来电后，深为焦急，立刻打长途电话去南京，但是叫不通，随即拍发了一个急电给蒋介石和白崇禧，请白千万不要来，说来了会对新疆局势极为不利等语。电报发出后，张治中彻夜未眠，等待着南京的消息。六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左右，白崇禧的行李已装上飞机，随行人员及送行者亦多到了机场，当白本人正预备乘车前往飞机场时，收到张治中的电报，他很不高兴，但张既来电阻其行，只得请示蒋介石，蒋亦收到了张的电报，遂囑白中止新疆之行。一九四八年春我到南京，有一天白崇禧约我到 he 家里吃

饭，谈及这件事，白愤激地对我说：“文白（张治中的别号）说是怕刺激苏联，不让我到新疆去，这真是从未听说过的怪事，新疆是中国的领土，我作为国家的国防部长，到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去旅行视察，难道也要经苏联的批准才行吗？……”张治中为什么要力阻白崇禧去新疆呢？据他对我说：“白健生以反苏反共著称，现在北塔山事件又牵扯到苏联，他一来，必然引起苏方的严重不满，我们都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人所代表的伊犁势力，是有其背景的。现在我们和伊方，正处在紧张和微妙的阶段，白健生在这个时候到新疆来，不啻火上加油，会使局势更为不利……”等语。

六月八日我北塔山守军击退外蒙军的攻击后，战争并没有从此结束。他们的飞机在六、七月里，几乎是经常在北塔山上空盘旋侦察，曾有两三次竟然飞到奇台上空侦察，在六月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均继续有小规模的战争。到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两日，外蒙军又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其飞机在我阵地及其附近投弹甚多。这两天的战斗，较六月七、八日两日战争的激烈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幸我守备兵力已增强，阵地工事，利用山上的大树木做掩盖，也已大为坚固。对方投掷的轻磅炸弹及炮弹，已经不能摧毁我阵地，所以外蒙军的进攻，又一次被我守军粉碎了。这一次我守兵仅伤亡七、八人，外蒙军死伤的在三十人以上，在北塔山北面的山麓胡芝尔特附近，外蒙军遗尸十多具，还有几匹马也被击毙了。到七月三日，又有一次激战，其飞机投弹颇多。据当时任骑兵第一师师长的韩有文（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来信，就他的回忆，自六月五日发生冲突后，前前后后一共有过大小战斗二十多次，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以后才未再有战争。

乌斯满部约有二、三千人，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间离开北塔山附近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带南下到奇台附近居住。

缴获的外蒙军的文件地图旗帜等，我曾派专人送到南京国防

部，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驳斥外蒙抵赖向北塔山我守军进攻的侵略行为的有力证据。

镇压吐鲁番暴动的经过

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偶然发生的，总是有它的规律和它的内在联系。吐鲁番事件也正是这样的。当新的省政府刚刚组成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便利用张治中亟图求安的心情，首先推荐伊方的阿不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当时我对这一决定是有意见的，曾对刘孟纯（刘是西北行辕秘书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说：“吐鲁番是通往哈密及内地交通的咽喉，也是国军补给的基地，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一个县，交由伊方的人担任县长呢？”刘说：“我也觉得不妥，但主任（指张治中）觉得省府刚刚组成，阿副主席第一次推荐县长，不便拒绝，所以就通过了。”我说：“这样一来，吐鲁番地区恐怕从此多事矣。”

阿不都热合满接任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吐鲁番南面的一个乡镇）为中心，积极从事组织活动，策划武装暴动。同时，由于吐鲁番是维吾尔族人居住较多的地方，伊方人员大力宣传，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吐鲁番发生武装暴动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次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则是为形势所迫，而不是伊方的预定计划。因为这时他们积聚的力量并不够，准备不充足，群众也还未很好的发动起来，所以其结果这次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先把促使伊方过早地发动这次暴动的近因简单地叙述一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张治中邀同阿合买提江副主席，王曾善厅长（民政厅）、赖希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以及监察使麦斯武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人，由迪化飞到阿克

苏，继到喀什、莎车、和阗等地视察，回程时又访问了库车、焉耆两地，走遍了南疆五个行政专区，历时二十三天。在这五个行政区里，除焉耆区以回族、蒙族人较多外，其余四个区的居民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尤以喀什区为最多，计有九十多万人，成为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阿克苏区专员为色以提，是当地的一个大阿訇，也是一个大地主；和阗区专员为郝登榜，是个地主，善汉语，是一个汉化的维吾尔族人；莎车区专员为周芳刚，是汉族人。焉耆区专员为左曙萍，也是汉人。这四个区的行政负责人与驻军密切配合，使得伊方派去活动的人，很不容易开展工作。所以张治中等到这四个区视察时，一切平静无事，邀来谈话的人，都表示拥护张主席和省府的施政纲领，既没有控诉，也没有请愿，张治中感到十分满意。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新疆的省府成立未久，张治中即同意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的提议，在省府会议通过任命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为喀什行政专员，这个人是当地有名的亲苏人物，也是伊犁革命派的同情者。伊方派去的大批人员在他的庇护下，很快地发展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和其他各种活动。在张治中未到喀什以前，我们早已接到驻在喀什的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的好些电报，说维吾尔族青年经常有组织地游行示威，对驻军采取敌视态度，形势十分不稳等等情形。张治中等到喀什后，住在老城的专员公署里（喀什有两城，一为老城疏附，一为新城疏勒，两城相距九公里。老城较大，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居住，是商业的中心，行政机构亦多驻此。新城主要为驻军和一部分汉人居住），在第二天的群众欢迎大会上，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麦斯武德讲话后，有几个维族青年登台讲演，痛斥汉族官吏过去对新疆的残暴统治，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成立地方民族军队，要求严惩他们认为是反动的地方领袖人士等等，群众对这些讲话，给以热烈的鼓掌和支持，并要求张治中答复。张企图说服他们，但说得舌敝唇焦，只是枉费，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对张提出更多的责难和吼叫。这样持续了

四、五个小时，无法解决。张治中只得黯然下台离去。待到五月初，张等自和阗返喀，仍住专员公署，当晚七时起即被群众五、六千人所包围，要求张治中答复前次所提各条，并新提了若干条。张治中对他们作了长篇讲话，主要阐明拥护国家统一与民族意识的关系，但这些话对群众不起任何作用。他们所要求的是具体问题具体答复，而内中涉及关系重大的问题，例如要国民党军队撤离新疆，成立民族军队等问题，则又是张治中所不能轻易作答的。僵持到深夜一点多钟，群众仍然不散，而且声势愈来愈汹涌，弄得张治中毫无办法，想找阿合买提江出来解围，但阿合买提江早已离开专署，不知在何处？由于群众的态度愈加激烈，张治中的侍从人员深恐发生暴动，危及张的生命，有一人从专署后院的一个侧门溜出，跑到电话局（因这时专署的电话已被请愿群众所控制）打电话给在新城的赵军长汇报情况。赵锡光知道此时如贸然派兵前来弹压，可能发生严重后果，乃自己乘车前来探看情形。他走到专员公署门前，看见人山人海，声音鼎沸，知道不能进去，立即绕到后院从侧面进入。张的侍卫人员见赵来，大为喜慰，乃悄悄地告诉张治中。张与请愿代表们谈判了一整夜，弄得精疲力竭，正苦于无法解脱，乃托词入内，即随赵锡光从后门溜出，乘车奔新城。这时，已是天将破晓矣！张到新城后，虽然松了一口气，安全也已无问题，但张对阿合买提江和行政专员阿不都克木买合苏木所给予他的窘迫和难堪，是十分愤激的，因此他决定立即离开喀什，他叫赵锡光派车到专员公署接其他同行的人来新城，规定于八时起飞（飞机场在新城南门外），而这是阿合买提江等所没有料到的。当阿合买提江赶到机场后，张立命同行者登机起飞，地方官员没有一人赶到送行。

张治中于五月上旬回到迪化后，态度大变，他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对我和刘任（西北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说：“这些家伙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我苦心谋求新疆的和平当做怯懦，对我们着着进逼，除非我们全部撤离新疆，否则是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

的。”我问今后打算怎样做？张治中毫无踌躇地说：“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决不再容让。我们对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人士，凡愿意拥护国家，服从中央（指南京政府）的，我们应尽量扶植他们，信任他们；凡反国家，反政府的，我们必须约束他们，制裁他们……”我们对张治中过去作法的过分容让，早有不同意见，现在看到他态度改变，并且这样坚定，当然很高兴，一致表示拥护他的主张。在当天晚上我们就商定了撤换喀什区专员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本，在维吾尔人士中物色一个适当者继任。

张治中回省城后，曾邀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伊敏厅长、赛福鼎厅长、赖希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刘孟纯秘书长、王曾瑜厅长、刘泽荣特派员等，座谈了三天，企图扭转局势，消除双方激烈的斗争，张的最后结论是：新疆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是一切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必“再革命”、“再暴动”。张又说：“新疆人民不需要战争，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着重法治，放弃主观；着重国家民族利益，放弃派系私见；尊重民主领导，放弃政治斗争和一派控制；消除矛盾，使言行、内外、上下归于一致，这才是光明远大的前途。”张治中提出要求伊方放弃政治斗争，这是阿合买提江等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他们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实现。

张治中并没有和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协商，就于五月十日前后电蒋介石请辞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推荐当时担任新疆监察使的麦斯武德继任。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曾留学土耳其，他过去因反对盛世才的统治，被迫逃亡内地，在国民党政府里搞了十多年，任过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务，自张治中到新疆负责后，他才回到新疆，并由南京政府派任新疆监察使。

麦斯武德和当时任建设厅长的伊敏及省府委员艾沙等人在政

治上是属于泛土耳其主义。这一派人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的，对苏联式的革命，深存戒心。他们在开始时曾极力鼓吹民族思想，为伊斯兰教徒争自由与独立，有些人还是革命暴动的思想领导者和组织者，但随后他们感觉到新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又害怕苏联式的革命，因此主张在中国的名义下来设法实现新疆的民族自治。这些人，曾主张更新疆省为突厥省（关于这个问题，伊敏和艾沙曾对我谈过好几次，他们说“新疆”这两个字是意味着汉人新扩张的领土，含有殖民主义的意义），经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的同化政策。不脱离中国，不搞独立运动，反对汉人统治，反对阶级斗争，是这一派人的基本纲领。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五月十九日批准张治中辞去新疆省府主席的兼职，并任命麦斯武德继任新疆省府主席。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伊方的强烈反对。五月二十日迪化市街上就发现了反对麦斯武德的传单标语。张治中于二十一日约见阿合买提江，把国民政府的决定告诉他，他立即表示不同意，举出许多理由，要求张治中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一直到省长民选时为止。张则表示命令已经发表，无法改变。

五月二十八日麦斯武德举行就职典礼，伊方的省府委员都没有参加。在典礼会上，喀什的省参议员乌斯满以代表的资格发言，要求张治中把自己亲手签订的和平条款与省府施政纲领彻底执行等语。用意很明显，就是不赞成麦斯武德当主席。

麦斯武德就职后，紧接着就有属于伊方的省参议员四十余人致书张治中，认为和平条款尚未贯彻，省政府的任务尚未完成，省府不应该改组；又说省府副主席及委员们事先都不知道，省参议员亦未同意，更换领导是不适当的，坚决请求不要变更。张治中复信则说和平条款并不因主席的更换而不能贯彻，中央有权更换所任命的委员和主席，中央任命麦斯武德为主席，是符合新疆人民愿望的合理措施。要求中央变更命令绝不可能等语。

与此同时，另有属于哈密、阿克苏、和阗等区的参议员六、七十人联名致书张治中，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欢迎麦斯武德充当省府主席。

这样，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者和泛土耳其主义者（又称突厥主义者）在反对或拥护麦斯武德当新疆省府主席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伊犁方面的一家报纸，曾尖锐地抨击张治中的这一作法是中国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的发挥。

伊方除在其所控制的三区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麦斯武德运动外，在其他七区，也通过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反对运动，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喀什和吐鲁番、托克逊、鄯善等地。在喀什所采取的方式，是集会讲演，游行示威。而在邻近省会的吐、鄯、托三地，则采取了军事行动。这是吐鲁番暴动事件的又一近因。

由阿合买提江所推荐的阿不都热合满充当了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为基地，积极组织“东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团”，编练青年，并通过在迪化的阿合买提江等人在政治上便利的掩护，不断地秘密运输武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早已获有情报，并曾一再向张治中汇报，判断可能发生变乱。张治中一开始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以后则指示注意侦察和防范。自五月二十八日麦斯武德就任省府主席后，紧接着于六月五日爆发了北塔山事件，我们曾抽调驻在迪化附近的一部分部队开往奇台一带，伊方更是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开始发难。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相继发生下列事件：

1. 在吐鲁番的新城附近，一再抢夺国民党卫兵枪支，并有一名士兵负重伤。
2. 十几人一群，二、三十人一群，在吐鲁番附近拦劫军车，阻扰运输，并劫走车上的军粮、器材等，先后发生四、五次。
3. 阿不都热合满等人经常召集群众在吐鲁番县维文会开会，煽动民众不要把粮食出售给政府……积极鼓动当地人民起来

仇视汉人，驱逐驻军。

4. 托克逊在吐鲁番西面六十华里，是通往南疆的要地。伊方也派人在这里组织了一股力量，以托克逊城西约一百多华里处的阿拉沟为基地，由阿合买提江派来的伊方干部海米提为首，聚众四、五百人，有枪四、五十支，不时侵扰公路，阻止南疆的粮食运往北疆，有一次被他们打死打伤旅客各一人。同时他们也夺取伊拉湖附近民间的粮食马匹等。托克逊县政府曾派人前往劝说招抚，他们提出要国民党军撤离吐、鄯、托三县，罢免麦斯武德省府主席职务等要求，因而未获结果。

5. 在鄯善方面（鄯善在吐鲁番东面约七、八十华里）亦于七月八日有武装群众百余人，围攻连木沁警察所，杀戮全部官警，夺去该所所有的枪支马匹；旋又围攻汉墩警察所，该所官兵早有准备，据守碉堡内抵抗，未能得逞。这一部分人乃集结于东西克可牙尔山地，从事游击活动。鄯善县政府派员前往劝抚，他们自称是“革命军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提出七项要求，主要的仍是要国民党军撤离吐、鄯、托三县，并罢免麦斯武德省府主席职务，与托克逊阿拉沟的那一部分如出一辙。

6. 七月十日在鄯善洋海附近又有二百余人突然袭击该地警察所，击毙警察数名，夺去枪数支，并将县府在该地的库存粮万余石洗劫一空。

这段期间这些小股力量的种种行为，从其演变进展来看，是脉络相贯的，可看出阿合买提江等人制有一定计划，企图以此试探张治中的反应如何？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后，我曾向张治中建议：1. 立即撤换吐鲁番县长阿不都热合满；2. 命令当地军警对这些“暴徒”进行镇压；3. 酌量增加吐、鄯、托三县的驻军兵力。张治中深悉这样作，便会和伊方完全决裂，使新疆一年来的和平局面将不能维持下去，因而表示犹豫。指示我们容忍，再静观一下，看看伊方的下一步行动再说。我根据张的指示，分电各军师团长，要他们尽可能地容忍避让，来维持新疆的和平，同时要他

们保持高度的警惕，严密戒备，如“暴徒”敢于袭击驻军，则坚决予以还击。

阿合买提江等看见张治中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又无想谈判的表示，认为张是处境困难。因当时国共战争打得很激烈，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国民党政府无力西顾，张的任务是力求稳定新疆局面，所以不敢采取镇压措施，害怕破裂，使战端重开。他们基于这样的判断，决心进一步发动攻势，企图打出一个谈判的局面来。

七月十二日晚在托克逊的一股力量突然围攻库米什，企图消灭该地驻军，截断南疆交通。库米什是托克逊至焉耆公路上的一个市镇，在托克逊西南约一百多华里，当时驻有一二八师的两个连。一二八师师部驻在焉耆。

七月十二日吐鲁番县县长阿不都热合满、副县长巴武东等离开县城，潜赴三堡，会同由迪化派出的维文会主任科员那满江等，指挥吐鲁番、鄯善两地力量，计有有组织的武装步骑战士约六、七百人，加上纠集起来的群众共约千余人，拥有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五、六百支，于十三日上午四时开始袭击胜金口。胜金口位于吐鲁番东面约三十公里，是通往鄯善、哈密的要地，由胜金口沿公路向东行，两边便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同时在胜金口附近有一座重要的桥梁，为维护交通安全，我们派有步兵一营在此驻守。这些部队住在山口公路两侧高地自己修建的碉堡里。当时在吐鲁番、鄯善两地共驻有约四个营的兵力（包括驻胜金口的一个营在内），归第七十八军所属的一七六师师长田子梅指挥，师部驻在吐鲁番。

吐、鄯、托三县武装集中力量攻打库米什、胜金口两地，这着棋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些地方是南北疆交通的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这次暴动如能成功，可以影响南疆、东疆等地相继发生变乱，可以威胁迪化，可以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把国民党驻新部队截分成三部分，陷入极端不利的形势。

据守库米什、胜金口的部队要求给予紧急支援，各军师团长纷纷来电请求坚决镇压，尤以第七十八军军长叶成自其驻地——呼图壁赶来见我，涕泣而道，如再不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矣！我根据这些情况和各级部队长表现的情绪，向张治中作了汇报，请求他当机立断，勿再犹豫。张治中知道吐、鄯、托三县是联系南疆东疆咽喉之地，决不能被伊方控制，而自断其生命线，乃毅然决然地对我说：“坚决镇压，彻底肃清，交你全权处理。”张治中这种坚定的态度和语气，使我感到安慰。因我那时负全疆军事指挥之责，在那样复杂的情势下，如因过分退让而坐失广大土地，对南京中央政府无以交代，所以时怀危惧。我深恐张还会反复，乃进一步问他：“如果阿合买提江等要求你不要用兵，请设法和平解决，你何以对付？”张答：“我自会对付。你照我的话去办就行。”我在张治中那里辞出后，回到警备总部，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第七十八军军长叶成、骑第四十六师师长罗恕人、供应局局长夏日长、本部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等人，听取参谋处的情况报告后，会议决定部署如下：

1. 立即电令库米什、胜金口两处驻军，坚决抵抗，固守待援。
2. 命马军长即电驻在托克逊的冶长寿骑兵团，除留一部守备托克逊县城外，由冶团长亲率主力迅即赶往胜金口，击破“暴徒”，并加以扫荡。
3. 命叶军长即电驻在哈密的一七八师师长莫我若派出步兵两营乘汽车（当时在哈密驻有一个汽车兵团）赶往胜金口支援，会同冶长寿团击破该股“暴徒”并消灭之。
4. 电令驻焉耆的一二八师师长钟祖荫指派一位团长率相当兵力，立即往援库米什，并消灭该股“暴徒”。
5. 命驻迪化的四十六师立即派出步兵一营由供应局备车运往达板城（达板城位于迪化至吐鲁番公路的中间，离迪化约有

八、九十公里)以南一带高地布防，截击流窜的“暴徒”。

6.将情况电告各地驻军，要他们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如发现暴动的可疑行迹，应立即予以镇压。

我记得这次会议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开的。会议决定后立即付诸实施。

七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左右，包尔汉副主席来访，说有要事急需和我面谈，我已猜到八、九分，抱定决心不妥协退让，见面后闲谈了好一回，还没有涉及正题。包尔汉原希望我问他来访的目的，便可乘机转到话题来，我则装作若无其事和他闲聊。他忍不住了，突然问我：“最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说：“包副主席所指的是什么呢？”包尔汉说：“我听说在吐鲁番、托克逊一带发生民众闹事，还听说从迪化运送军队到那边去，不知实在情况究竟怎样？”我说：“那边是发生了问题，是有组织的暴动，不是普通一般性的闹事。”包尔汉问：“我想请问宋总司令，你打算怎样处理？”我反问他：“包主席见过张主任没有？”包尔汉说：“我刚从张主任那边来，并向张主任建议，不要采取武力镇压，最好是和平解决。”我问：“张主任怎样答复你？”包尔汉说：“张主任说他对情况也不大清楚，他要我来问宋司令并商谈一下。”我说：“自从阿不都热合满任吐鲁番县长以来，积极从事各种组织活动，特别是秘密地搞地下武装，我们早已侦知。最近一个月，他们拦劫军车，阻挠运输，掠夺国军士兵枪支，袭击警察所，并对群众进行恶意宣传，挑拨民族间感情，威胁民众，拒绝售卖粮食于政府……他们的种种行为，早已激起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怒。新疆警备总部本着张主任的意旨，劝勉全体官兵，以极大的耐心，忍辱避让，俾使新疆已奠定的和平基础得以巩固。现他们竟然明目张胆进攻国军，企图消灭吐、鄯、托三县的驻军，截断南疆东疆的交通，犹如扼住一个人的咽喉一样，想这样来置我们于死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除了坚决抵抗，坚决镇压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包尔汉听了我有激

昂情绪的一段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说：“我看最好是不流血，可否由省政府和警备总部会同派人前往调查一下，再研究解决办法。”我站起来严肃地对他说：“这没有商谈的余地。”包尔汉看见我这样坚决的态度，知道说亦无益，遂告辞而去。

镇压暴动的经过：

库米什方面：七月十二日晚有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约二、三百人，突然袭击库米什，遭到当地驻军的抵抗，攻击者由于缺乏作战训练，又没有重兵器（如迫击炮、机枪等），只凭一股勇气，多次向驻军猛扑，伤亡颇大，均被击退，到十三日下午又增加了两百多人，继续向驻军攻击，战斗了一个整夜，仍未奏效。十四日一二八师派来的增援部队赶到，将该股武装完全击溃，除毙伤及俘虏外，全都溃散了。公路交通始告恢复。

胜金口方面：七月十三日晨，有组织和具有相当训练的武装六、七百人，占领胜金口南北高地，持白色方形的“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旗帜多面。拂晓前向胜金口驻军袭击，驻军据守碉堡抵御，这些碉堡多半是用大石头或砖块修砌起来的，相当坚固，碉堡周围又挖有外壕，堡内储存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弹药，守军官兵都是从内地到新疆去的，都是汉人。他们知道，如果不坚决战斗，被“暴徒”攻破，就绝无生路，唯一的就只有拼命抵抗。这些游击队较库米什方面的那部分作战能力要强得多，而且携有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手榴弹颇多，攻击相当猛烈，一步一步地逼近碉堡，向守军投掷手榴弹多枚，企图炸破碉堡或使碉堡部分倒塌。但因碉堡做得相当坚固，未能实现其目的；相反地，守军在碉堡内用机枪扫射，并投出手榴弹，使攻击者伤亡惨重。据守军营长程某（忘其名）事后告诉我：估计当天（十三日）击毙了一百多人，伤者可能更多些。十三日的战斗延续到黄昏，游击队向驻军的多次攻击，均未奏效，阿不都热合满等继续从各方纠集力量，增加到千多人，将胜金口严密包围，并将吐鲁番、鄯善之间的电

话、电报线加以破坏，将胜金口附近公路桥梁烧毁，企图延缓我军的增援，以达到其消灭胜金口驻军的目的。十三日夜間，这些“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又有数百人接近碉堡，并有些人用梯子越过外壕，靠近堡下，反复猛扑，志在必得。这样，使守军遭到相当伤亡，指挥员也有些沉不住气了，曾使用无线电话报告战况并请求紧急救援。十三日晚激战彻夜，喊声震天，守军在“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的激励下，终于打退了游击队的多次进攻。但攻击者只是遭到挫折，并不想放弃围攻胜金口的计划，所以他们仍继续纠集力量，调整部署，准备再次发动攻击，以期一举歼灭守军，但增援部队适时赶到，打破了他们的企图。驻在托克逊的骑五军直属骑兵团，除留一连守备托克逊外，其余由团长冶长寿率领于十四日上午二时左右出发，以急行军向东疾进，六时左右即已到达胜金口附近，正值“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攻势顿挫的时候，骑兵部队行动迅速，很快就夺取了胜金口南北一带高地，并向聚集在几处的游击队冲杀。同时，由哈密用汽车运输的先头营，亦于六时左右赶到了胜金口以东地区，占领高地，逐次向胜金口逼近，形成东西和内外夹攻之势。阿不都热合满等人看见形势不利，乃分股向洋海、二堡、三堡、木头沟、苏巴什等方向退去，原驻胜金口的守军与增援部队会师后，立即分头尾追，这些游击队在胜金口遗尸二百多具（多半是被骑兵部队打死的），随后追击队伍又在胜金口东北的群雄村附近消灭了一股约七、八十人，其余的大多逃散了，剩下有四百余人向东西克可牙尔山窜去。东西克可牙尔山位于鄯善东北奇台西南之间，地区颇广，形势重要，新疆历次发动的暴乱，多以此为起点。残余的“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进入山里后，又突于十六日向七角井驻军围攻，守军沉着抵御，双方激战了一整天，至十七日晨，由鄯善派去增援的队伍赶到，东西夹击消灭游击队二十多人。他们见势不佳，乃又回窜入东西克可牙尔山，并经常阻断吐鲁番、鄯善与奇台、木垒河间的交通，仍然是相当大的威胁。我根据这些情况，乃命驻在鄯善、

七角井、奇台一带的部队，各抽出若干兵力分路入山搜剿。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先后在宽沟、克可牙尔山等地与游击队遭遇，发生战斗，被毙俘百余人。残余不足三百，无心恋战，乃急急经七泉湖、热水泉、煤窑沟向西流窜。二十四日夜，游击队在三个泉子与派在该地担任堵击的四十六师部队发生战斗约一个小时后，乘夜继续西窜，于二十五日窜抵小羊湖，又与我另一部分堵击队伍遭遇，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游击队又被毙俘数十人。至此，这个“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的残余，仅存百余人矣。据俘虏供称：“他们几天来，每天要走一百多里，多半是夜间沿着山沟里走，因山地居民少，很不容易找到吃的，弄得饥疲不堪。在这残余的部队中，以伊犁派来的人占多数，他们宣称只要脱离国军的包围圈，就可沿着天山向西窜到乌苏去。”二十五日由小草湖续向西窜的百余人，当天窜抵阿拉沟，并在托克逊西南三十华里处，阻击商车一辆，有旅客四人遇难。二十六日晨窜抵托克逊西边的布尔城，除向居民索取粮食外，并把这个村子的马匹全部虏走。驻达板城的部队与驻托克逊的部队分别自东南方向追剿游击队残部，于二十九日在布尔城与柯尔城中间地区以及柯尔城附近山地，先后遭遇，经过几次的小战斗，又毙俘五十余人，残余不足百人沿着天山向西窜走了。听说这部分人不久到了伊犁，被当地群众当作英雄，给予热烈欢迎。

吐鲁番暴动平定后，根据张治中的指示，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会同新疆省政府组织了一个宣慰团，共有二十余人，由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梁容若率领，前往吐、鄯、托三县，安抚民众，办理善后等事宜，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其工作的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镇压吐鲁番暴动后，麦斯武德派了人去当县长，该县的警察局长，则是由军统系统的人去担任。听说这个特务利用这一事件，在吐鲁番县继续逮捕了许多人，并残酷地杀害了一些人，此事我和张治中事前都不知道，及到我们得知后，张治中曾严厉责

备当时担任军务处（实即军统的新疆站）处长余万选、副处长饶铁珊等人，但亦无补于事了。

吐、鄯、托暴动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四时左右，张治中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并对我说：“为预防其他地区相继发生暴乱，应采取预防措施，除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外，对于在各地进行‘东土耳其斯坦’组织活动的重要分子，应查明加以逮捕管制。喀什为南疆重镇，尤宜特别注意……”他随即在我的办公桌上亲自写了两份电稿，一份是发给驻在喀什的第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一份是发给驻在和闐、莎车、阿克苏、焉耆、哈密等地的部队头目的。电文的大意，和他对我的讲话大致相同。各军师团长根据张治中的手令，在南疆、东疆各地进行了逮捕，就我的记忆，在喀什一地，逮捕了四、五十人，在其他各地，共逮捕了二、三十人，总共约有七、八十人。一九四八年七月我离开新疆时，这些人大部分均未释放，以后是交由陶峙岳负责处理的。张治中亲笔所写的逮捕令电稿以及镇压吐、鄯、托暴动经过的全部案卷，我也均亲自移交陶峙岳接收。

镇压吐鲁番暴动后，伊犁的一家报纸评述这一事件时，说：“张治中是唱白脸的（幕后人），宋希濂是唱黑脸的（打手）。”这两句话，确是恰当地形容了张治中和我的本质。

吐、鄯、托暴动事件平息后，自然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重大的打击，他们认为和张治中已无继续合作的可能，遂于八月上中旬，原由伊方参加省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相继离开迪化回伊犁去了。至此，这个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派和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东土耳其斯坦派合作组成的省政府，仅仅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便宣告破裂了。